

## 許梓桑與日治時期的基隆中元祭\*

吳蕙芳\*\*

許梓桑是日治時期基隆重要地方領袖，曾任基隆街長、區長及臺北州協議會員等職，服務鄉里近半世紀；中元祭乃日治時期基隆此一海港城市最受矚目的傳統節慶活動，其規模遠較媽祖、城隍爺、開漳聖王及日本神社等祭典來得盛大。本文實將日治時期基隆重要地方領袖與傳統節慶活動整合討論，特別關注的是，許梓桑當時不僅具備重要政治身分，在社會地位上，他同時擔任基隆許姓宗親會會長、慶安宮管理人，以及基隆同風會會長。三種角色在基隆中元祭的傳統節慶活動裡，實肩負不同職掌與工作，如基隆中元祭自清咸豐五年開始即由地方上十一姓輪流負責每年主普(外壇)普度工作，許姓即為其中之一；慶安宮則是基隆最受重視、屬海神信仰的媽祖廟，亦每年中元普度內壇所在地；基隆同風會乃以改良社會風俗為主要任務之新式社團，且有殖民政

---

\* 本文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案(編號NSC99-2410-H-019-004-)補助下之部分研究成果，撰稿期間曾蒙基隆許姓宗親會提供相關資料；文成後，初稿宣讀於「2010海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辦，2010.10.08-09)；投稿後，復蒙兩位匿名審查者提供寶貴意見。對於上述諸多幫助，筆者由衷感激，謹此致謝。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聯絡地址：20224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2號(No. 2 Pei-Ning Road, Keelung, Taiwan 20224 (R.O.C.))。

府的支持力量。三種不同性質團體在基隆中元祭此一重要地方傳統節慶活動中，其影響如何？而三種角色齊集許梓桑一人之身，其又該如何扮演？這些問題以往鮮為人注意，亦少有探究分析者。本文即針對上述課題尋求解答，提供學界參考了解。

關鍵詞：宗親組織、慶安宮、同風會、普度、媽祖信仰、地方領袖

## 一、前言

許梓桑(1874-1945)(參見附圖一、二)，號迺蘭，<sup>1</sup>祖籍漳州詔安，清同治十三年(1874)生於基隆新店。父許福壽早亡，由寡母胡淑(1838-1913)扶養成人。<sup>2</sup>少受私塾教育，師承世居基隆福德之舉人江呈輝(1872-1917?)，<sup>3</sup>故漢學造詣

<sup>1</sup> 迺蘭為許梓桑之字或號，說法不一。本文以當時日本官方及其詩社友人陳其寅之說法為準。又許氏友人習以「迺蘭」稱呼他。參見〈支那近情——許梓桑〉，《實業之臺灣》，第17卷第4號(不明出版項)，頁77；〈詩壇——送迺蘭社兄游閩中〉，《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4月8日，6版；〈詩壇——同迺蘭社兄遊月眉山〉，《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5月18日，5版。另有關於許氏生卒年分及生平事蹟之概述短文頗多，有當時人之記錄(無論是臺人或日人)，亦有後人之刊載，茲依時間先後列舉如下：大園市藏編，《臺灣人物誌》(臺北：谷澤書店，1916)，頁144；橋本白水，《評論臺灣之官民》(臺北：南國出版協會，1924)，頁85-86；〈臺灣表彰四功勞者皆不可多得人物附記平山許三氏略歷〉，《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1月19日，8版；林進發，《臺灣人物評》(臺北：赤陽社，1929)，頁55；簡萬火，《基隆誌》(基隆：基隆圖書出版協會，1931)，〈附錄〉，頁1；大園市藏，《現代臺灣史》(臺北：日本殖民地批判社，1934)，第十編，〈中心人物〉，頁41；大園市藏編，《臺灣の中心人物》(臺北：日本殖民地批判社，1935)，頁141；臺南新報社，《臺灣大觀》(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據1935影印)，頁11；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頁79；《臺灣紳士名鑑》(臺北：新高新報社，1937)，頁267；谷元二，《大眾人事錄(第13版)》(東京：帝國秘密探偵社，1940)，頁16；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株式會社興南新聞社，1943)，頁117；《基隆市志·人物篇》(基隆：基隆市文獻委員會，1956)，頁24；〈許梓桑先生像贊〉、〈祭許社長梓桑文〉，兩文均收入陳其寅，《懷德樓文稿》(基隆：財團法人基隆市文化基金會，1992)上冊，頁28-30；唐羽，《臺陽公司八十年志》(臺北：臺陽股份有限公司，1999)，頁457-458；《基隆市志·人物志·列傳篇》(基隆：基隆市政府，2001)，頁31。

<sup>2</sup> 許母胡淑亡於大正二年(1913)六月十日午後八時頃，享壽七十五，由此回推其出生年分應為道光十八年(1838)。胡淑過世消息見〈寶婺埋光〉，《臺灣日日新報》，1913年6月12日，6版。又本文中有關許梓桑祖籍及父母資料均來自其嫡孫許庭謨先生之口述(基隆市許姓宗親會，2010年7月23日)。此外，日治時期有資料指出，許梓桑本姓胡，乃農家子弟，後養於基隆商賈許某為嗣，故改姓許。見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頁26。

<sup>3</sup> 簡萬火，《基隆誌》，頁31。日人占領臺灣後，江呈輝離開基隆，定居福建汀州府一帶，其間曾回基隆探訪親友。相關內容可參見〈士族歸臺〉，《臺灣日日新報》，1897年6月16日，1版；〈雜報——廣文旋梓〉，《臺灣日日新報》，1904年11月11日，4版；〈江孝廉來遊〉，《臺灣日日新報》，1904年12月29日，3版。

頗深，尤好詩詞，曾撰《慶餘堂詩稿》，惜未傳世。<sup>4</sup>今欲見其詩作須藉助日治時期報紙資料與日人期刊、方志之零星刊載。<sup>5</sup>

乙未(光緒廿一年，明治廿八年，1895)割臺，日本殖民統治基隆，時地方傳統士紳，如前述之舉人江呈輝，以及秀才張尚廉、陳錫疇、林李成、林太樞，儒生沈藍田、王清臣等人均內渡，<sup>6</sup>不願在異族統治下生活，致日本殖民政府須藉助仍留下之臺籍傳統士人，協同維持社會秩序及政治運作，而當時年僅廿一、準備參加科舉考試的許梓桑，即被日人網羅擔任基隆街庄長事務所書記，開啟從政之路。明治卅六年(1903)，許氏接替前任之吳志清為基隆街庄長、區長、總理；<sup>7</sup>大正九年(1920)地方制度改革，許氏轉任基隆市協議會員、基隆街協議會員、基隆街名譽助役、臺北州協議會員等職，直至二戰結束。綜觀許梓桑從政歷程，幾乎等同於日本殖民統治基隆之歷史。這段期間，他被殖民政府稱為「基隆第一人」，<sup>8</sup>肯定其對政府政策之支持，且貢獻地方甚鉅，故授予敕定藍綬褒章，並多次得到總督府及州廳之表彰。<sup>9</sup>

<sup>4</sup> 慶餘堂為許梓桑位於玉田半山上之私宅，1930年落成，今已成廢墟。相關圖像與說明可參見陳青松，《基隆第一·人物篇》(基隆：基隆市立文化中心，2004)，頁11。

<sup>5</sup> 許梓桑所作詩詞散見於《詩報》、《臺灣日日新報》中，如其祝賀要員擔任新職之詩作，見〈中島完一少將榮昇為陸軍通信學校長賦此壯行〉，《詩報》，1935年5月15日，10版；其上京參與盛會之詩作，見《詩報》，1940年11月19日，16版；又其祝賀報社新築落成之詩作，見〈記臺灣日日新報社新築落成〉，《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1月28日，4版。許氏亦曾以「迺蘭」為名寫詩題詞，如其形容公園美景之詩詞，見〈詞林——前題(遊高砂公園即景)〉，《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7月29日，1版。許氏也常以名、號並列方式(「迺蘭許梓桑」)寫詩題詞，如其描述晚年居所「慶餘堂」風光之詩詞，見〈詩壇〉，《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6月16日，8版。至於刊載於期刊或方志之詩作，如其〈基隆八景〉詩可見於《臺灣教育會雜誌》，第29號(臺北，1904.08)，頁15；亦見於石坂莊作編，《基隆港》(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臺1版，據臺北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1917年3版影印)，頁190-191。

<sup>6</sup> 簡萬火，《基隆誌》，頁31-33；〈基隆支廳管下の秀才〉，《臺灣日日新報》，1896年10月29日，3版；〈游子思鄉〉，《臺灣日日新報》，1898年11月27日，6版。

<sup>7</sup> 〈區長歡迎〉，《臺灣日日新報》，1903年2月13日，4版。

<sup>8</sup> 橋本白水，《臺灣統治と其功勞者》(臺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99，據臺北南國出版協會，1930年版影印)，頁124。

<sup>9</sup> 〈支那近情——許梓桑〉，頁77；林進發編，《臺灣官紳年鑑》(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據臺北民眾公論社，1934年4版影印)，頁123；〈基隆市協議會員〉，

透過政治經歷基礎，許梓桑亦參與地方社會、民間團體諸多事務，如其為臺北瀛社中堅成員、基隆大同吟社與詩報社名譽社長，亦為基隆許姓宗親會會長、基隆慶安宮管理人，以及基隆敦俗會與同風會之會長，對基隆民間社會應有相當程度的影響。本文即針對許梓桑在日治時期基隆民間社會之角色扮演與影響加以探究，特別聚焦於基隆中元祭的課題。

蓋日治時期，基隆此一海港城市之重要節慶活動，據當時臺灣新聞報記者簡萬火觀察，指出有五，即神社、媽祖、城隍、開漳聖王、中元。然其仔細分析後認為：

每年新曆六月三日，即基隆神社之祭典，頗呈盛況；同舊曆四月十七日，即慶安宮湄州媽祖之祭典及行列，其熱鬧亦非他市所可比；同舊曆八月十六日，即護國城隍廟之祭典，其行列亦頗可觀；同舊曆十月十九日，即奠濟宮開漳聖王之祭典，亦不遜於前列。惟每年之祭典日，雖曰盛況，然不及於每年舊曆七月廿五、廿六，兩日慶安宮之慶讚中元。於廿五日，係燃放河燈之熱鬧，當夜景象，燈光點點，燭火焰焰，輝紅徧市，有如白晝，且加以陣頭團體，樂隊人羣，頗呈一時之盛況。廿六日乃普施孤魂之時，其盛典特占全島之第一也。<sup>10</sup>

日治時期報紙亦載有：基隆中元普度「大開盂蘭之會，其祭品豐富奢華，為全島冠」、<sup>11</sup>「基隆街中元普施，一年中最熱鬧之大賽會期」、<sup>12</sup>「基隆之中元普施，為全島第一奢華」等語。<sup>13</sup>可見中元祭實日治時期基隆海港城市最盛大的地方傳統節慶活動。惟當時基隆中元普度活動之運作實涉及傳統血緣關係之宗親組織、海神信仰之媽祖廟宇，甚至新式社團因殖民政

---

《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12月27日，2版；〈臺灣教育會から今日表彰さる一人人午前十時から府會議室に表彰式舉行〉，《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10月30日，2版；〈臺灣教育會功勞者表彰式〉，《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10月31日，夕刊4版；〈臺灣表彰四功勞者皆不可多得人物附記平山許三氏略歷〉，《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1月19日，8版。

<sup>10</sup> 簡萬火，《基隆誌》，頁144-145。

<sup>11</sup> 〈準備中元〉，《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8月9日，6版。

<sup>12</sup> 〈準備盂蘭〉，《臺灣日日新報》，1915年8月15日，6版。

<sup>13</sup> 〈基隆特訊——普施先聲〉，《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9月13日，6版。

府之要求改良風俗，亦在此節慶活動中扮演一定角色。屬地方領袖身分、擔任諸多社團職務的許梓桑自然有其相當程度影響力。因此本文透過許梓桑與中元祭之關係，將日治時期基隆的地方領袖與傳統節慶活動整合討論，提供學界參考了解。

## 二、身為宗親會會長的許梓桑與基隆中元祭

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宗親組織所以在基隆中元祭活動裡倍受重視，關鍵就在於清咸豐五年(1855)開始施行的姓氏輪值主普制。由於咸豐三年(1853)基隆發生大規模漳泉械鬥，咸豐四年(1854)又有小刀會動亂，死傷甚為慘重。當時為超度大量死於非命之亡魂，令生者得安心度日、平順生活，地方父老決議由具實力的十一姓(張廖簡、吳、劉唐杜、陳胡姚、謝、林、江、鄭、何藍韓、賴、許)輪流負責每年中元祭裡的主普(外壇)普度工作，<sup>14</sup>因而使得此重要祭祀活動持續至今。

惟清代至日治初期(明治、大正年間)，基隆並無以宗親會為名之血緣組織，當時僅有因同鄉、同業或同姓等因素共祀神祇而聚集的神明會、祖公會、父母會、共祭會等團體。此類團體日治時期總稱之為神佛會，<sup>15</sup>故當時輪值主普各姓辦理普度活動涉及之血緣組織應為這些神明會或祖公會，並非今日所稱之宗親會。據明治卅六年及昭和八年(1933)刊行的臺灣舊慣記事、社寺教會調查報告等資料，可知當時屬輪值主普十一姓的神明會或祖

<sup>14</sup> 咸豐年間基隆漳泉械鬥有三次，分別發生於咸豐三年、九年(1859)及十年(1860)，而小刀會動亂有兩次，分別發生於咸豐四年及八年(1858)。相關史料與說明參見吳蕙芳，〈地緣衝突的血緣化解？基隆中元祭與姓氏輪值主普制〉，《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1期(臺北，2009.05)，頁54-61。

<sup>15</sup> 據日治時期專研臺灣舊慣的丸井圭治郎指出，神佛會中最重要者為神明會與祖公會，其中，神明會聚集之條件有十項，即同鄉、同時渡臺、(渡臺時)同船、同街庄、同業、同職、同趣味、同階級、同種族及年齡相近者；祖公會聚集之條件則為同姓、同宗者。然同姓或同宗者所祀神明若有祖先以外之神佛時，則祖公會即成為神明會。相關說明參見丸井圭治郎，《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臺北：捷幼出版社，2006，增訂1版，據1919版刊印)第1卷，頁82-86；丸井圭治郎先生遺著，曾景來譯，〈臺灣舊慣的神佛會〉，《南瀛佛教》，第12卷第12期(臺北，1934.12)，頁17-19。

公會，有供奉梓潼帝君的張廖簡姓正心堂、保生大帝的吳姓大道公會、劉榮公的劉唐杜姓劉榮公會、開漳聖王的陳胡姚姓開漳聖王會、孝義侯的謝姓孝義侯會、天上聖母的林姓新慶社、東峰公的江姓會、國姓爺的鄭姓國姓爺會、安撫公的何藍韓姓安撫公會，以及保生大帝的賴姓大道公會，<sup>16</sup>獨不見許姓有類似組織或團體的刊載。

事實上，從清咸豐五年開始實施姓氏輪值主普制，到光緒廿一年日本殖民統治基隆為止的四十年間，許姓已輪值過三次主普工作(分別為同治四年、1865；光緒二年、1876；光緒十三年、1887)；日本殖民統治基隆初期(明治、大正年間)的三十年間，許姓亦曾輪值主普三次(分別為明治卅一年、1898；明治四十二年、1909；大正九年)。當時許姓是由何人或何種團體負責，以及如何進行每次之主普工作，限於史料，難以窺知。惟可確認的是，直至日治初期，許姓皆無以血緣為基礎形成之同姓團體；許姓宗親會的正式出現是在日治時期的昭和年間。

昭和二年(1927)一月，已為臺北州協議會員的許梓桑與許清英等數人欲籌設基隆、金山、雙溪、汐止等地之許姓宗親會，訂一月廿一日午後一時於許梓桑宅開磋商會。<sup>17</sup>三月三日午後二時，即在高砂樓開創立發起人會，由創立代表許梓桑、許清英、許聯壽三人發柬邀集各方許姓宗親。<sup>18</sup>當時對參與者並無區域限制，無論遠近，只要是許姓成員均歡迎加入，並預定舊四月初舉行發會式，將會員分成三種，即名譽會員每年贊助金三十圓，特別會員每年金十圓，與普通會員每年會費三圓。<sup>19</sup>同年五月十八日午後二時，於基隆高砂樓旗亭正式開創立總會，選出會長許梓桑，副會長許海亮、

<sup>16</sup> 此十姓中的九姓，即張廖簡、吳、劉唐杜、陳胡姚、謝、林、鄭、何藍韓、賴姓的神明會或祖公會資料可見於《臺北州下に於ける社寺教會要覽》(臺北：臺灣社寺宗教會，1933)，頁33-34；〈神佛會一覽〉，《南瀛佛教》，第17卷第2期(臺北，1939.02)，頁57。而江姓神明會資料則見於安藤靜，〈神明會の性質〉，《臺灣慣習記事》，第3卷第7號(臺北，1903.07)，頁660；又此文亦有中譯本，見安藤靜，〈神明會之性質〉，《臺灣慣習記事(中譯本)》(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第3卷第7號，頁34。

<sup>17</sup> 〈基隆——籌設宗親會〉，《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1月19日，4版。

<sup>18</sup> 〈基隆——許姓宗親會〉，《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3月2日，夕刊4版。

<sup>19</sup> 〈許姓宗親會募集會員〉，《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3月6日，夕刊4版。

許清英，另由會長指定之幹事廿一名、議員十二名，及監事九名共同處理會務。緊接著於五時舉行發會式(參見附圖三)，邀請地方官紳，如深水要塞司令官、佐藤市尹、岩田署長、佐藤市助役，以及顏國年(1886-1937)、潘榮春、張士文、王塗盛、黃鄉齒(1871-1957)等地方要人二十餘名與會，並由許天送發表演說。時入會許姓宗親約二百名，不限基隆一地，有來自桃園、臺北等地者。<sup>20</sup>其後，許姓宗親會於同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基隆高砂樓開首次定期總會。<sup>21</sup>

基隆許姓宗親會成立後次年(昭和三年，1928)，許梓桑即與臺北的許智貴、<sup>22</sup>許丙及其它有志宗親數人，<sup>23</sup>頻議籌設全島許姓宗親會，欲網羅全臺該姓人士以籌建許姓大宗祠，透過宗親會的成立以團結全臺許姓族人力量。此目的明白見諸其創會文書：

水無本則竭，木無本則折，人而無本，何以示後，是故敬祖尊宗，大孝之道，協和九族親親之誼，溯我許姓，乃四岳伯夷之裔，而神明之胤也，其後建國河南，世濟其美，子孫蕃衍，遍於九州，其在臺灣，眾逾十萬，然散處各地，不相往來其何以行大孝之道，而敦親親之誼乎，我等念祖德之宏深，謀蒸嘗之綿遠，爰卜臺北靈秀之地，建築臺灣許姓宗祠，附設宗親會春秋祭祀，飲福致祥，遠近舉集，休戚相關，於以知木本水源之理，豈不懿哉，然茲事體重大，需費恐多，非藉眾材難成雄舉，所難族中伯叔兄弟，各發巨心，慷

<sup>20</sup> 〈許氏宗親會發會式期〉，《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5月15日，4版；〈許氏宗親會發會盛況〉，《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5月23日，夕刊4版。

<sup>21</sup> 〈許氏宗親會十八日定期總會〉，《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11月18日，夕刊4版。

<sup>22</sup> 許智貴與許梓桑均為臺北州協議會員，亦臺北州聯合同風會成員。其相關資料參見大園市藏，《現代臺灣史》，第10編，〈中心人物〉，頁38-39；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頁497；林進發編，《臺灣官紳年鑑》，頁11；林進發，《臺灣人物評》，頁49-51；〈臺北州協議會第一日午後議事質疑應答頗不寂寥〉，《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12月20日，夕刊4版。

<sup>23</sup> 許丙為臺灣總督府評議員，其相關資料參見橋本白水，《臺灣統治と其功勞者》，頁24-26；橋本白水，《評論臺灣之官民》，頁92-93；大園市藏，《現代臺灣史》，第10編，〈中心人物〉，頁20-22；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頁82；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頁118；林進發，《臺灣人物評》，頁11-14；林進發編，《臺灣官紳年鑑》，頁30；《新高新報》，1930年2月15日，9版。



慨捐助，以為人望，則光前裕後之圖，永垂不泯矣。<sup>24</sup>

該目的亦可見於當時宗親會的重要代表許松英之感言中。蓋許松英原為清代基隆富商家族之後，日本殖民統治初期曾歷任守備憲兵、警察之通譯與頂雙溪第一區區長，往來官場甚久，協助處理諸多地方事務，<sup>25</sup>並捐款地方公益事項。<sup>26</sup>後辭官職，專心經營貿易，與弟許招春開業瑞泰商行於臺北大稻埕，即轉往臺北發展。<sup>27</sup>昭和年間，許松英積極投身全臺許姓宗親會之創立工作，並有感而發地在報紙上撰文言：

洵溯我許姓謀建築宗祠之提議，早見於四十年前，推其因循未果者，總為細故叢生，事久多變，致使前人宿願，蘊蓄莫伸。……而我同宗散處臺陽者，眾逾十萬，素乏團結機構，罔知所以敬祖尊宗之道，雖欲敦親親之誼，烏可得乎，覩面無親難怪世人之譏誚矣，是故建築全臺許氏宗祠，附設宗親會之舉，不可不謂當今之急務，鄙人有鑑於此，不自揣綿薄，舉首疾呼，思欲提倡之，未免貽笑大方，然尤望體察愚誠，同聲附和，籍無分漳泉閩廣，人不論士農工商，凡為太岳之裔，出高陽之系者，亟宜勇躍向前，報名入會，俾會早告成立，然後計議策立宗祠之事，則承先啟後，一舉而兩得，豈不懿

<sup>24</sup> 〈許姓籌建宗祠並設宗親會〉，《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月14日，4版；又類似史料亦見於〈許姓宗親會開發起人會〉，《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2月3日，4版。該史料另載有宗親會會則，內言及宗親會之重要工作乃「建築家廟，祭祀祖先，編纂許姓沿革志、人物志、族譜等」。

<sup>25</sup> 許松英曾協助招安三貂頂雙溪匪首，並協調西皮與福祿的地方派系之爭。參見〈用得其人〉，《臺灣日日新報》，1897年8月25日，1版；〈惡習已除〉，《臺灣日日新報》，1897年10月2日，1版；〈不容掩沒〉，《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12月2日，4版。

<sup>26</sup> 許松英於大正七年(1918)曾以瑞泰商號之名參與「博施團施米會」救濟孤寡。見唐羽，《魯國基隆顏氏家乘》(臺北：基隆顏氏家乘纂脩小組，1997)第7冊，頁702。其亦於大正十年(1921)獅球嶺平安宮改建時獻金四百圓。後該廟立碑紀念，撰文中即言該廟於「去歲季夏因大震牆屋半為傾圮，張君士文、許君松英竭力募資翻造」，且將許松英名及其獻金數目列捐獻者名單之首。見〈獅球嶺平安宮重修誌〉(大正辛酉冬季冬月董事暨紳商等立)、〈大正拾年辛酉冬季改築寄附金氏名列于左〉兩碑刻。又此二碑刻亦見於許文堂編，《大基隆古文書選輯》(基隆：基隆市立文化中心，2004)，頁169、174。

<sup>27</sup> 〈非可逆料〉，《臺灣日日新報》，1900年5月8日，4版；〈有心商務〉，《臺灣日日新報》，1903年3月19日，4版。

歟，幸勿裹足，勉為一鼓，是所厚望焉！<sup>28</sup>

臺灣許姓宗親會創立磋商會成立後，從速籌募建宗祠之經費。昭和三年二月四日大會召開時，即席便有樂捐千圓以上者，而千圓以下之建築費捐助者亦多有人，狀至踴躍，令發起者許梓桑、許智貴、許丙、許澤清等人頗為滿意。<sup>29</sup>許澤清、<sup>30</sup>許松英二人，並往中南部擴張會務，<sup>31</sup>終於該年十二月十六日正式成立臺灣許姓宗親會總會。當時在臺北江山樓一連三天演戲助興，場面頗為盛大(參見附圖四、五)。<sup>32</sup>

惟昭和四年(1929)十二月廿五日，基隆許姓宗親會開定期會員總會時，已討論宗親會的存廢問題。所以有此討論，實「因近來開會時，出席者漸少，不能達到親睦目的」，而「細查原因，似在於會費滯納，不敢出席」，<sup>33</sup>亦即許姓成員已出現財力困窘情形，故會中議決從昭和五年起不徵會費，並仍維持宗親會之存續。然此舉似未真正解決問題，因昭和五年(1930)十二月十四日午後三時半，宗親會於高砂樓旗亭開定期總會時，會長許梓桑主動提出解散意見，原因為「年來會費，殆不納入，本會若存續，則須費用，恐致缺損，且臺北已經有組織全島宗親會，本會雖解散，可任意加入於臺北」。後經大家贊成，遂決定解散，並將現有會費八百六十六圓三十四錢，充作明年輪值主普之費用。<sup>34</sup>

基隆許姓宗親會從成立到解散僅四年不到(1927.03-1930.12)，顯現日治時期基隆許姓成員力量已沒落不似清代。其實，許姓在基隆初期歷史發展中，雖曾貴為漢人著名三大族之一，<sup>35</sup>然日治時期的基隆許姓似已甚為沒

<sup>28</sup> 許松英，〈許姓宗親會創立之感想〉，《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5月15日，4版。

<sup>29</sup> 〈許姓宗親會磋商創立〉，《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2月6日，夕刊4版。

<sup>30</sup> 許澤清居臺北大稻埕，初經營茶業，後涉及金融業、信託業等，對創立宗親會促進同宗間之和睦，及宗親子弟之教育關注甚多。相關說明可見林進發，《臺灣人物評》，頁96-97。

<sup>31</sup> 〈人事欄〉，《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8月9日，夕刊4版。

<sup>32</sup> 許天乞，〈臺灣許姓宗親會之由來〉，收入許漢卿總編，《臺灣許姓宗親會創立六十週年特刊》(臺北：臺灣許姓宗親會，1987)，頁131-132。

<sup>33</sup> 〈許姓宗親總會〉，《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12月2日，4版。

<sup>34</sup> 〈基隆許姓宗親會決議解散存金充主普費用〉，《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12月18日，4版。

<sup>35</sup> 日治時期漢人記者簡萬火撰寫基隆地方史書時曾提及：「鷄籠之漢民族，自古以

落，因當時人們論及同、光年間，基隆許姓之代表人物時，僅提到許紹文與許石麟二人；其中，許紹文為金包里務農人家，屬頗有文譽之武秀才；許石麟乃田寮港農人，以孝名著稱，<sup>36</sup>兩人均非以財力或勢力見聞地方，而是因功名與孝名傳播鄉里，令人印象猶新、記憶深刻。

又從前述基隆許姓宗親會成立之過程中，亦可觀察出此一宗親會的基礎並不穩固。因基隆許姓宗親會創立之初，其召募對象即不限基隆許姓成員，而是遍及金山、汐止、雙溪，乃至臺北、桃園等北臺地區，似顯示基隆許姓成員之數量與力量有限，若僅囿於基隆一地者，實不足以組成及維持宗親會。同時，基隆許姓宗親會之創會過程中，曾提及若干重要之許姓代表人物，如後來擔任會長的許梓桑、副會長的許清英、會員的許聯壽三人，均為居住基隆當地之許姓，另一副會長許海亮則屬基隆郡金山庄之許姓。除此之外，似有不少來自外地的許姓成員，如在會中曾發表演說的許天送來自桃園，<sup>37</sup>而許松英、許智貴、許丙、許澤清等人則均屬臺北許姓宗親。<sup>38</sup>又或因宗親會裡，基隆當地之許姓成員人數與能力均有限，故前述許姓宗親會於高砂樓舉行發會式，並在會後開宴慶祝時，主張「是日費用，為不使會員負擔，由有志者寄附」。身為基隆當地許姓之許梓桑、許清英及許聯壽三人即合資一百七十圓招待與會眾人，此獻金實占總額三百圓的一半以上。<sup>39</sup>

---

來，其最著名大族者有三，即稱為三貂吳、水尾許、深澳杜是也。」其中水尾指得是金包里水尾街，惟不知此內容所指之確切時間究竟為何。見簡萬火，《基隆誌》，〈基隆誌序(李碩卿)〉，頁2、127。

<sup>36</sup> 簡萬火，《基隆誌》，頁33、35；《基隆市志·人物篇》，頁31。又日治時期報紙資料載許紹文於乙未後曾倡亂金包里，對日本殖民統治政權構成威脅，報紙甚至稱其為「土匪」。參見〈海濱匪難〉，《臺灣日日新報》，1897年9月14日，1版；〈屯所襲擊事件公判〉，《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9月17日，2版；〈屯所襲擊事件判決〉，《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9月20日，2版；〈未歸順土匪の動靜〉，《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12月17日，2版。

<sup>37</sup> 據臺灣許姓宗親會資料指出，許天送乃桃園一學校訓導。見許天乞，〈臺灣許姓宗親會之由來〉，頁131。

<sup>38</sup> 〈臺灣許姓宗祠創立沿革〉，收入許漢卿總編，《臺灣許姓宗親會創立六十週年特刊》，頁133。

<sup>39</sup> 〈許氏宗親會發會盛況〉，《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5月23日，夕刊4版。其中，許梓桑出資七十圓、許清英、許聯壽各出資五十圓。

成員人數較少是基隆許姓宗親會面臨之重大隱憂外，因成員人數過少造成之財力限制，更令許姓宗親會實難維持後續發展。蓋日治時期，基隆許姓宗親會究竟有多少成員，且成員各為何人，因無確切名單，難以詳細分析。然就目前能掌握之人名探究其背景，可知基隆當地之許姓代表，除許梓桑外，許清英是海產物商，<sup>40</sup>許聯壽是甲長，<sup>41</sup>許海亮則為金山庄的酒類販售商，兼營袋米、茶葉生意。<sup>42</sup>亦即基隆許姓宗親具財力與勢力者非常有限。由於日治時期的基隆許姓在地方上實力頗為有限，當時報紙報導輪值主普各姓時，每每提及許姓均未予正面肯定，顯示其力量確不若他姓之實況。如許姓宗親會未成立前的明治卅一年，乃許姓於日治時期首次輪值主普。報紙比較各姓情況後認為：基隆輪值主普十一姓中的「林陳張劉」負責主普祭品豐盛，然許姓輪值主普則表現「稍遜」。<sup>43</sup>大正九年，許姓於日治時期三度輪值主普時，<sup>44</sup>報紙提及：

本年輪值許姓，主宰普事。在基隆方面，許姓人數無多，散處金包里、三貂、石碇及臺北附近，數年來各姓，竭厥出力，踵事增華，年盛一年，以炫世人耳目，而在基隆許姓，勿論人少，即殷實之家，亦僅有一二；如此少數之人，當此主普大事，又值物價騰貴之秋，必藉各方面凡屬許姓者，念一本之親，互相資助，或寄附緣款，或

<sup>40</sup> 許清英為基隆海產物商，屬臺灣海陸物產株式會社成員，原居新興街六番地，後遷至媽祖宮口新樓屋。參見〈基隆——新興街のボヤ〉，《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11月13日，4版；〈人事〉，《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3月13日，夕刊4版；〈基隆——物產總會〉，《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1月23日，夕刊4版。

<sup>41</sup> 〈基隆署て功勞者表彰〉，《臺北州時報》，第2卷第7號，頁58。

<sup>42</sup> 許海亮參與之事業及相關說明可參見〈地方近事——金山〉，《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6月26日，3版；〈兩庄聯合品評會〉，《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10月19日，4版；〈製茶品評會〉，《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10月8日，2版；大園市藏編，《臺灣人物誌》，頁271；簡萬火，《基隆誌》，頁181；許進發編，《臺灣官紳年鑑》，頁104。又許海亮於戰後之二二八事件中遇難，相關過程可見其子許榮文之口述，載於張炎憲等採訪記錄，《基隆兩港二二八》（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4），頁264-267。

<sup>43</sup> 〈基隆盂蘭盛會記〉，《臺灣日日新報》，1898年9月16日，3版。

<sup>44</sup> 許姓輪值主普從清咸豐五年開始至今(2011)已有十三次，其中，清代三次(1865、1876、1887)、日治時期五次(1898、1909、1920、1931、1942)、戰後五次(1953、1965、1977、1989、2004)。惟日治時期第五度輪值主普時(1942)，因逢戰爭時期，日本殖民政府僅保留祭典儀式，禁止慶典活動。

準備豬隻，屆時助祭，共襄盛舉。<sup>45</sup>

而昭和六年(1931)，許姓四度輪值主普時，許姓宗親會已經過成立至解散之歷程，報紙觀察此次許姓輪值主普情形，載曰：

本年主普，輪值許姓，去六日午後三時，許姓代表許梓桑氏，邀集市內重要許姓諸人，於許姓慶餘堂磋商主普事宜，竝於席上各捐緣金，許清英氏五百分，許梓桑氏三百分，其餘數十分者甚多，每分按出金一圓以內，金包里、雙溪、臺北各方面，及市內各處，另行派員招募。聞許姓，為主普十一姓中之最少人數者，諸同人不落人後，各踴躍捐出。<sup>46</sup>

字裡行間可見基隆許姓人少財力有限，惟仍儘量辦妥輪值主普事之努力。

事實上，即是因為日治時期基隆許姓力量沒落不如以往，相關中元祭活動往往只能完成傳統輪值主普之分內工作，無法像其它輪值主普姓氏對主普外之三大柱活動有更多參與。據目前可掌握到的，日治時期從大正十四年(1925)至昭和十一年(1936)的十二年間，基隆中元普度四大柱負責人姓氏名單及其統計如下：<sup>47</sup>

年份/公元、日本、中國	主普	主會	主醮	主壇
1925、大正十四、民國十四	謝	林	柯	林、〔基源商行〕
1926、昭和元、民國十五	林	林	陳、鄭	張、蔡
1927、昭和二、民國十六	江	林	劉	周、柯
1928、昭和三元、民國十七	鄭	林	陳、郭、周	林、陳
1929、昭和四、民國十八	何藍韓	范	郭、陳、董	柯、陳
1930、昭和五、民國十九	賴	林	張、劉	吳、朱、蔡、劉、謝
1931、昭和六、民國二十	許	蔡	顏、楊	張、吳

<sup>45</sup> 〈基隆特訊——中元輪值許姓〉，《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5月22日，6版。

<sup>46</sup> 〈基隆慶安宮普施先聲本年主普許姓〉，《臺灣日日新報》，1931.07.13，4版。

<sup>47</sup> 日治時期，基隆中元普度四大柱負責人及其背景之說明可見吳蕙芳，〈地緣衝突的血緣化解？基隆中元祭與姓氏輪值主普制〉，頁79-82；惟本表將名單中之個人及商號名稱去除，僅保留姓氏以便於分析說明。

1932、昭和七、民國廿一	張廖簡	林、謝、張、 陳	劉	謝
1933、昭和八、民國廿二	吳	江	賴	賴、林
1934、昭和九、民國廿三	劉唐杜	林	<b>楊</b>	何
1935、昭和十、民國廿四	陳胡姚	江	<b>楊</b>	<b>許</b>
1936、昭和十一、民國廿五	謝	<b>許</b> 、陳	吳	<b>黃</b>

## 輪值主普十一姓

姓氏	張廖簡	吳	劉唐杜	陳胡姚	謝	林	江	鄭	何藍韓	賴	許	總計
數量	1.75	1.7	2.7	2.91	1.45	7.75	2	0.5	1	1.5	0	23.26
比例	4.86	4.72	7.5	8.08	4.03	21.53	5.55	1.39	2.78	4.17	0	64.61
排序	五	六	三	二	八	一	四	十	九	七	十一	

## 其他雜姓與不明者

姓氏	楊	柯蔡	周	董	黃	郭	曹	范	顏	朱	不明	總計
數量	2.5	3.7	0.85	0.33	1	0.66	1.5	1	0.5	0.2	0.5	12.74
比例	6.94	10.28	2.36	0.92	2.78	1.83	4.17	2.78	1.39	0.55	1.39	35.39
排序	二	一	六	十	四	七	三	四	八	十一	八	

說明：斜體粗黑字表不屬輪值主普十一姓之成員，〔 〕表未能查出負責人商號。又比例計算方式如下：獨立擔負該年該項工作者以1計，若工作有二姓參與以1/2計，三姓參與以1/3計，其餘以此類推。

由上表可知，基隆中元普度活動中輪值主普的十一姓裡，有十姓除既定的主普工作外，亦普遍參與主會、主醮及主壇三大柱之普度工作。此比例近 65%，即三大柱的普度工作僅 1/3 左右是由不屬輪值主普十一姓的其它雜姓負責。而輪值主普十一姓之參與三大柱普度工作中，又以林、陳、劉等大姓投入最多，實承擔三大柱工作總量的 1/3 以上，惟所有輪值主普十一姓中，僅許姓完全不涉入三大柱任何事務。

又在日本殖民統治初期，報紙資料更有載許姓為節省花費，藉故逃避

普度工作之實例。蓋明治卅五年(1902)，陳姓輪值主普時，因疫情嚴重，殖民政府為預防起見，諭令普度停止。然輪值主普陳姓代表陳擺茂反對，親自上書基隆廳長要求進行普度活動，而另三大柱負責人許梓桑、矮仔喜、汪漢忠則遵從長官命令停辦活動。事後，報紙觀察指出：「三大柱各自主張，祇以不遺官命為重，初非為吝惜些少之費起見也！」<sup>48</sup>可見限於財力，許梓桑為能減輕負擔則儘量避開相關工作。

此外，為因應傳統輪值主普十一姓有勢力沒落者，頗難應付每年普度工作之實際狀況需求，故昭和六年，即許姓宗親會解散的次年，又逢許姓輪值主普時，許梓桑曾召開會議討論其它新興大姓加入輪值主普行列的可能性。當時報載：

基隆慶安宮，孟蘭盆會，自昔以張吳劉陳謝林江鄭何賴許，計十一姓，輪流主普，視為一種權利，絕對不許他姓加入，每當主普之時，必踵事增滿，互相競爭不已。然物損星移，昔推為大宗之許江賴等姓，今已不及十一姓外之顏李黃楊王蔡諸姓為大宗。識者有鑑及此，適本年輪值主普十一姓中最終之許姓，秉此機會，歡迎他姓加入。特於日前，慶安宮評議員會時，主普十一姓代表，齊集席上，由許梓桑氏提議，開放與他姓加入，一同贊成，遂決議許以他姓加入主普。凡有希望加入主普之姓，限至舊七八之間，正式向慶安宮報名好，便準備參加云。<sup>49</sup>

可見許姓力量在日治時期沒落乃不爭之事實。也因此，許姓宗親會無論存在與否，其在每次輪值主普工作上所能提供之實質幫助應屬有限，此與當時新興的黃姓情形頗為不同。

蓋基隆黃姓原非輪值主普十一姓成員，然黃姓在 1920 年代全臺普遍興建祖祠與修纂族譜風潮影響下，於昭和元年(1926)正式成立宗親會後，即積極投入中元祭之相關活動。無論是最初僅參與由輪值主普十一姓主辦之水燈與陣頭遊行活動，或十年後(昭和十一年)負責主壇之普度工作，黃姓均力

<sup>48</sup> 〈普度雜俎〉，《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8月26日，4版；〈普度訂正〉，《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8月28日，4版。

<sup>49</sup> 〈慶安宮主普十一姓外參加八月報明〉，《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7月14日，夕刊4版。

求表現並獲好評，使黃姓聲望不斷提升，黃姓力量亦逐漸擴增，並一直持續到戰後，最終爭取到成為基隆中元祭裡輪值主普的第十四個姓氏。<sup>50</sup>因此，日治時期，宗親會在基隆中元祭的角色扮演與地位影響，實因不同姓氏而有差異，應予仔細斟酌與評估。

### 三、身為慶安宮管理人的許梓桑與基隆中元祭

慶安宮是基隆甚受矚目、屬海神信仰的媽祖廟。早於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即有漳人築小廟於虎子山畔奉祀。後不斷拓墾，發展至港區一帶，於嘉慶十年(1805)，應當地貿易經商及捕魚維生等靠海生活者之需要，改立於基隆新店現址。當時屬漳人地域神信仰的開漳聖王廟(即今之奠濟宮)尚未興建，開漳聖王像是置於慶安宮側室供奉，因此，該廟亦為漳人信仰重鎮。咸豐年間，基隆發生數次漳泉械鬥與小刀會動亂，死傷慘重。後經地方父老決議，由當時具實力的十一姓輪流負責每年中元祭活動中的主普普度工作，以超度亡魂，令生者安心度日。屬漳人精神支柱的慶安宮，自然成為普度工作進行之核心據點。<sup>51</sup>

日治時期的慶安宮為基隆中元普度之內壇所在地，外壇四大柱(主普、主會、主醮、主壇)環繞四周，<sup>52</sup>其中，以主普最受重視。因其地理位置靠近當年漳泉械鬥發生地，故自清咸豐五年開始，即固定由十一姓輪流負責每年的主普普度工作，使超度亡魂工作不中斷。然主普外，三大柱則須委由不同負責人，以承擔每年的祭祀工作。日治時期，此工作即交由居內壇地位的慶安宮來協調人選之產生。

<sup>50</sup> 有關基隆黃姓在日治時期的崛起發展，並對基隆中元祭之積極參與，可見吳蕙芳，〈宗親組織與基隆中元祭——以黃姓宗親會為例〉，《兩岸發展史研究》，第4期(桃園，2007.12)，頁127-133。

<sup>51</sup> 有關慶安宮之背景淵源及早期發展情形，可參見吳蕙芳，〈海港城市的傳統節慶活動：以慶安宮與基隆中元祭為中心之探討〉，收入劉石吉、王儀君、林慶勳主編，《海洋文化論集》(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0)，頁318-326。

<sup>52</sup> 有關日治時期，基隆中元祭內壇與外壇四大柱(主普、主會、主醮、主壇)之分布圖，可參見吳蕙芳，〈地緣衝突的血緣化解？基隆中元祭與姓氏輪值主普制〉，頁90。



慶安宮早期的管理情形無從瞭解，僅知在許梓桑以前是由住持王六轉管理。<sup>53</sup>王氏因涉及不法變賣廟產事被當地居民驅趕，<sup>54</sup>故改由當時剛接任基隆區長的許梓桑負責廟務。許梓桑自明治卅六年擔任慶安宮管理人，至明治四十四年(1911)為該廟籌組董事會，使廟務運作更上軌道，並身兼董事及管理人身分，直到民國卅四年(1945)過世為止，參與慶安宮廟務超過四十年，期間為慶安宮累積廟產，功勞甚大。

據日治時期報紙刊載：許梓桑初接慶安宮管理人一職時，由參事蔡天培監交之廟產只有牛稠港墓地十五甲餘及現金三圓廿八錢。經其廿餘年之努力經營，至昭和五年時，慶安宮廟產評價達十餘萬圓，包含位於廟宇附近土地五百六十餘坪及其它土地、家屋，並買下牛稠港原有墓地周邊土地，以擴建為一般公用墓地。<sup>55</sup>這些廟產之買賣交易，均具備經官府認可之明確轉換文件；寺廟的年度收支預算書、決算書或計算書等記錄清冊，亦均由兩名信徒代表簽字保證，提交官府存查備用，以示帳目清楚交代。<sup>56</sup>惟隨著慶安宮廟產之大量增加，覬覦管理人職務者亦接踵而至。許梓桑並不眷戀重位。其曾數度請辭廟職，放手廟務，<sup>57</sup>令人對之感佩。今日，慶安宮內相關記錄，無論是宮誌、碑刻或廟方每年編纂之曆書，均有相當篇幅詳載許梓桑事蹟，<sup>58</sup>基隆耆老們口述回憶過往歷史時，也每每提及許梓桑對慶安宮

<sup>53</sup> 劉清番總編，《慶安宮誌》(基隆：基隆市慶安宮管理委員會，2001)，頁110。

<sup>54</sup> 日治時期報紙曾載王六轉違法變賣廟產，為人舉發，廢其職務之公告，見〈廣告〉，《臺灣日日新報》，1903年8月18日，4版。

<sup>55</sup> 有關慶安宮廟產擴增之詳細情形參見〈慶安宮管理人不日再選〉，《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5月19日，夕刊4版；〈基隆慶安宮許管理人堅欲辭退不日開臨時評議員會決定附同宮及基產造成沿革〉，《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6月3日，夕刊4版。

<sup>56</sup> 目前可見慶安宮之廟產相關文件有明治四十三年(1910)至大正二年(1913)、大正四年(1915)至大正五年(1916)之數份記錄。參見〈許梓桑外三名慶安宮所屬財產處分許可〉(1912.03.18)、〈許梓桑外二名慶安宮所屬財產處分許可〉(1912.04.11)、〈許梓桑外二名慶安宮所屬財產處分願許可〉(1913.04.01)、〈許梓桑神明會所屬財產處分許可〉(1915.01.01)、〈慶安宮管理人許梓桑外二名慶安宮財產處分許可〉(1916.01.01)。以上五份文件分別見於《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936冊，29件；第1937冊，3件；第2126冊，17件；第5920冊，18件；第6225冊，21件。

<sup>57</sup> 有關許梓桑與慶安宮之關係及許氏數度請辭管理人職務之詳細說明，可參見陳凱雯，〈日治時期基隆慶安宮的祭典活動——以《臺灣日日新報》為主〉，《民俗曲藝》，第147期(臺北，2005.03)，頁166-171。

<sup>58</sup> 劉清番總編，《慶安宮誌》，頁11、110、265-267；吳蕙芳，〈地方碑刻與基隆中

廟產擴增的貢獻，可見其重要性。<sup>59</sup>

日治時期，許梓桑以慶安宮管理人身分，往往參與基隆中元祭主普外三大柱人選之協調工作，乃使完整的祭祀活動得順利進行。如大正十四年，謝姓輪值主普時，其餘三大柱負責人未定，故眾聚慶安宮內協議，決定主會柱首林振盛商行，主醮柱首新吉發商行，主壇柱首三陽公司與基源商行。此外，本年重畫各柱區域，以明祭祀範圍，定市內福德、玉田、崁仔頂、暗街子全部、新興一小部、石硬港、獅球嶺，為主會部分；媽祖宮口新店、後井子、曾子寮、蚵殼港、牛稠港，為主醮部分；草店尾、石碑、新興、義重橋、哨船頭、鼻子頭、三沙灣、田寮港，為主壇部分。又為方便相關工作之進行，更決議來年度三大柱負責人選，以提早確認與準備。<sup>60</sup>

惟昭和元年，林姓輪值主普時，上年決定之負責人臨時有變。原決議負責主會的楊南海及泉成行均請辭，不肯承辦，原負責主壇的張東隆商行，亦因人及事業主要在臺北，基隆地方人面生疏，諸事不便，要求再增一名負責人以共同辦理祭祀事。故當年農曆七月六日午後四時，再邀集相關人士齊集慶安宮，磋商補缺及添員，後決定利記公司與張東隆商行共同負責主壇事。惟主會柱首始終協議不出人選，終議以主會區域內各保正輪流負責，費用由各保分擔。<sup>61</sup>

昭和二年，江姓輪值主普時，原定之各柱負責人又有變化，直至農曆七月二日午後二時，才由許梓桑邀請市內舖戶數十名，於廟內左室磋商數十分鐘後，才協議出負責人選。<sup>62</sup>

昭和七年(1932)，張廖簡姓輪值主普時，因基隆町名更改，恐影響各柱祭祀區域，許梓桑即於八月二日午後二時於同風會館，邀集重要人士，協議區分中元各柱區域及柱首擔當人。決議雖町名有變動，仍不影響原有規

元祭》，《書目季刊》，第44卷第1期(臺北，2010.06)，頁91-94；〈慶安宮湄洲媽祖與基隆名人許梓桑〉，《慶安宮曆書》(基隆：基隆市慶安宮管理委員會，2011)。

<sup>59</sup> 《基隆市鄉土史料—基隆市耆老口述歷史座談會記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48、123。

<sup>60</sup> 〈慶安宮中元豫聞〉，《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8月25日，夕刊4版。

<sup>61</sup> 〈慶安宮中元柱首變更〉，《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8月16日，夕刊4版。

<sup>62</sup> 〈基隆慶安宮三柱首決定〉，《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8月4日，4版。惟最終人選後亦有變動，見〈人事欄〉，《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8月10日，夕刊4版。

畫四柱區域範圍，同時議定當年及明、後年各柱負責人。<sup>63</sup>

昭和八年，吳姓輪值主普時，本決定主會柱首江瑞英，主醮柱首楊火輝，主壇柱首賴順發行。<sup>64</sup>然不久楊火輝因母病歿退出，臨時改由區域內保正合辦，而以較年長的賴愨為代表，且主壇亦追加林開郡，與賴順發行共同辦理。<sup>65</sup>

昭和十年(1935)，陳胡姚姓輪值主普時，許梓桑於八月一日午後二時，招集各保正及紳商於廟中協議。中元柱首，除主普輪值陳姓之外三大柱，主會江烏定、主醮楊火輝、主壇曹德滋，各負責準備相關工作。<sup>66</sup>

值得注意的是，前提及主普外三大柱之主會區域內以保正輪流負責中元普度事，實襲自慶安宮媽祖祭祀方式。蓋慶安宮管理人許梓桑「因鑑例年賽會，多藉保正之力，克臻盛況」，故於大正七年邀集市內各保正，齊集慶安宮，決議自當年起，以保正輪流為值東，或二人或三人聯合，共同辦理慶安宮廟會活動，週而復始。<sup>67</sup>當年輪值之保正林榮欽、羅欽、林秋波三人，「因恐下年後來者居上，故於事前極力準備，先向各郊行各團體鼓舞一番，務必錦上添花，大勝往年」，且「擬各以藝棚長閣及新鮮有趣之廣告法，出以增華鬪勝，屆時商況活潑，利市三倍」。<sup>68</sup>即保正們彼此間為力求表現，開始有互相競賽以較勁之心態，且欲透過藝閣陣頭展示，達商行店家廣告效果帶動商業發展。此與基隆中元祭裡水燈及陣頭競賽之風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今日基隆中元祭活動裡頗為人津津樂道者，即水燈及陣頭之遊行競賽。此活動並被賦予「以賽陣頭(普度賽會)代替打破頭(漳泉械鬥)」之族群融合意涵。<sup>69</sup>然事實上，清咸豐五年姓氏輪值主普制產生之主要目的，在確認

<sup>63</sup> 〈基隆慶安宮中元柱首三候補決定〉，《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8月8日，8版。

<sup>64</sup> 〈慶安宮中元祭典柱首及區域決定〉，《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8月24日，夕刊4版。

<sup>65</sup> 〈基隆——柱首異動〉，《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9月5日，8版。

<sup>66</sup> 〈基隆——柱首決定〉，《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8月4日，8版。

<sup>67</sup> 〈基隆媽祖祭定例〉，《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4月21日，6版。

<sup>68</sup> 〈基津特訊——基隆媽祖賽會先聲〉，《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5月17日，6版。

<sup>69</sup> 此說法普遍見於基隆之官方與民間出版品，如《基隆市志·風俗篇》(基隆：基隆市文獻委員會，1979)，頁430-431；洪連成，〈基隆中元祭的緣起〉，收入《滄海桑田話基隆》(基隆：基隆市立文化中心，1993)，頁108-109；陳青松，《基隆第一·

固定負責祭祀工作者，以每年持續超度死於漳泉械鬥及小刀會動亂中之大量亡魂，令生者得平順生活、安心度日，其原始重點並非陣頭遊行競賽。<sup>70</sup>惟日治時期的基隆中元祭確已普遍出現競爭場景，互賽局面，且競賽項目有三，即主普壇、牲豚祭品，與水燈及陣頭遊行。三者中，主普壇競賽是輪值主普十一姓在不同年間之競爭，且為群眾口碑評論，無正式比賽名次與獎項。牲豚祭品與水燈、陣頭遊行則為當年度正式比賽，有名次與獎項頒布，頗引人注目。惟牲豚祭品是輪值主普該姓宗親間之競賽，參與者有限，報紙著墨亦有限；水燈及陣頭遊行活動則是輪值主普十一姓及外姓、各工商團體及地方社團間之競爭，各單位均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與財力，打造眩目水燈及亮麗花車陣頭，甚為引人，故成為中元祭活動裡最受關注之項目，當時報紙均予以大篇幅報導相關內容。如昭和三年，鄭姓輪值主普時，於九月八日午後五時半放煙火三發，各姓及各團河燈齊集慶安宮前，共三十六番順序出發，報載當夜參加團體：

主普十一姓及柱首外，有新合順豚商、田寮港青年團、驛前舢船團、魚菜商團、新興安團、輕鐵會社團、芭蕉仲賣團、新店童子會團，及黃蔡王李楊葉各姓，各團多為龍燈，就中芭蕉仲賣團所裝藝閣，閣上滿飾花燈，燃以瓦斯火，燦爛奪目，比畫間所裝者，尤為雅觀；又李姓團，附以歌仔戲，乍行乍唱，最惹視聽。<sup>71</sup>

又昭和十年，陳胡姚姓輪值主普時，於八月廿三日夜各團陣頭遊行，是日：

主普陳姓龍燈藝閣故事十餘陣，合其他各姓及團體河燈，計三十餘陣，齊集於慶安宮前，由督隊者指揮出發，繞行全市，沿途觀眾擁擠不開，主普當局，依囑審查員數名，在泰記汽船會社樓上，審查陣頭優劣，其結果，優等，陳春氏之藝閣故事；特等，光明團之龍燈及洋樂隊；一等，陳大頭氏之大水燈排；以上各受主普當局授與

---

藝文篇》(基隆：基隆市立文化中心，2004)，頁97；臺灣基隆何藍韓姓宗親會編，《雞籠中元祭輪值主普姓氏源流》(基隆：臺灣基隆市何藍韓姓宗親會，2005)，頁183-184。

<sup>70</sup> 相關史料與說明，參見吳蕙芳，〈地緣衝突的血緣化解？基隆中元祭與姓氏輪值主普制〉，頁54-64。

<sup>71</sup> 〈基隆普施河燈行列並有藝閣參加〉，《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9月10日，4版。

賞狀及金牌各一面。其他優良者尚多，因有限制，不得全數入賞。<sup>72</sup>可見水燈及陣頭遊行參與者，含宗親組織的輪值主普十一姓、主普外三大柱負責人及外姓成員，工商團體的新合順豚商、魚菜商團、驛前舢船團、輕鐵會社團，以及地方社團的田寮港青年團、新店童子會等，且彼此競賽激烈，努力爭取榮耀。

當時為爭得獎賞，各團往往改良創新花燈，以爭奇鬥豔勝過他人。如昭和二年，江姓輪值主普時，「河燈中最有改良者，當推第六番江姓團之花燈隊；燈數最多者，其為輕鐵會社之龍燈；他如二十八番李姓團，三十二番黃姓團，亦有多少改良」；<sup>73</sup>昭和六年，許姓輪值主普時，參加遊行行列之燈排龍燈數十陣，其中，以楊姓自臺北請來之特大水燈排最受矚目，報載：

由臺北市東園町(加納仔)楊歪氏等發起，特大水燈排，參加燦行，其燈排長三十五米突，即百十餘尺，燈數七百餘盞，雖數次在臺北市內用過，然為基隆前所未見之大燈排。<sup>74</sup>

這種特別水燈排自臺北運至基隆，實大費周章，必須

於前一日，由縱貫道路，以團員百二十名，分為兩組，舉於肩上，運搬而來，第一組員六十名，由臺北運至汐止，第二組員六十名，自汐止運到基隆，總團員四百餘名。<sup>75</sup>

此類陣頭遊行活動所費不貲。然當年為許姓輪值主普，未見對此奢侈行為之制止，而同風會對中元普度之評論亦僅限於主普壇及祭品等之花費與改革諸事(參見下文)，對水燈及陣頭遊行活動未予多言。究其原因，應與此類活動之廣告宣傳效果與商業振興功用有關。如大正三年(1914)，謝姓輪值主普時，報載：

舊廿五日放河燈，金基貂石四堡，梨園子弟盡出，旗鼓燈排，纏繞滿街，好事者更以詩意藝棚，爭炫奇觀，其燈純用改良式，龍頭龍

<sup>72</sup> 〈基隆慶安宮中元第一日河燈盛況同風會乘機宣傳自治〉，《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8月25日，4版。

<sup>73</sup> 〈基隆河燈盛況惜行列中電燈全滅〉，《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8月25日，4版。

<sup>74</sup> 〈基隆慶安宮普度預聞警官將出取締〉，《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9月6日，8版。

<sup>75</sup> 〈基隆慶安宮中元加納仔燈排好評青年會員整理交通不軌之徒加以惡言〉，《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9月10日，8版。

尾，中綴燈球，一排多至數百燈，屈曲蛇行，倍覺有趣，聞尤以九  
大苦力組一排，最為生色，勞動神聖不誣也，臺北泰芳商行之談諧  
廣告，亦助熱鬧，斗大王菜燈數十對，厚臉者二人，一撐廣告，一  
曳紙鹿，到處圍觀如堵，事雖滑稽，可知島人商業競爭，思想漸有  
進步。<sup>76</sup>

可見當時水燈與花車遊行活動實屬商業性質，具廣告效果，故臺北商家亦  
遠道而來，欲在此熱鬧場合中打響知名度，宣傳自家商品。

大正十一年(1922)，吳姓輪值主普，報載：

中元普施，已於去十六夜，先放河燈，大小五十餘排，其製與臺北  
不同，因避電線，皆肩持平行，其燈或一層或二層，加以紙製龍首  
尾，委蛇而行，如火龍然，頗為雅觀。最長者三陽公司海部一排，  
多至二十餘節，綿延一街，二層燈數，計三百餘，聞由苦力一人一  
篝，故如是多，但皆紙製提燈，稍為遜色。次為謝姓新製龍角燈，  
光輝奪目，雖長不及三陽，而燦爛美觀，則過之。餘如吳姓主普，  
及林陳鄭蘇周各姓，亦皆可觀。督中間以小兒最短之小燈二三排，  
尤覺有趣；而打錫團所製之錫旗、錫轎、錫燈籠，燃瓦斯作廣告意，  
猶例年所無。<sup>77</sup>

亦可見中元普度之水燈及陣頭遊行活動，較勁意味與競賽氛圍中，實充斥  
著打廣告、作宣傳之商業功用。

事實上，日治時期，不論是慶安宮、奠濟宮、城隍廟之廟會，均有陣  
頭遊行活動，只是規模最大者為慶安宮。<sup>78</sup>當時報紙屢屢強調此一活動頻繁  
出現的廣告招牌與商業功能。如言大正七年，慶安宮遶境活動中，陣頭隊  
伍有「煙草商之帶騎長欄，及各色造成之廣告彩牌」；<sup>79</sup>又如大正九年，媽

<sup>76</sup> 〈基隆盂蘭會盛況〉，《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9月17日，6版。

<sup>77</sup> 〈基隆特訊——河燈盛況〉，《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9月19日，6版。

<sup>78</sup> 〈基隆城隍繞境先聲本年盛大舉行禁止披髮帶枷〉，《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9月16日，夕刊4版。當時報紙曾比較基隆各迎神賽會活動後言：「以媽祖繞境為第一熱鬧，次則城隍賽會。」亦有認為城隍廟會之盛大與慶安宮媽祖賽會並稱或介於伯仲間。見〈基隆城隍祭〉，《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9月12日，3版。

<sup>79</sup> 〈基津特訊——賽會紀盛〉，《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5月29日，6版。

祖廟會之陣頭競賽中，參賽者之一的惠邑團裝飾之吹簫引鳳及嫦娥奔月二閣，只獲褒手中，不敵水產會社的紙魚紙鳥獲賞三等金牌，因而不服抗議，惟當時報紙曾載惠邑團陣頭內容及公眾評論是：

第二十一番泉郡惠邑團，裝吹簫引鳳，及嫦娥奔月故事，簫上橫立一稚妓，以鐵管由下衣穿透上衣，不見痕跡，似危險卻極自在，下一妓且行且吹之，奔月閣亦雅緻，惜無廣告意，難博賞鑑。<sup>80</sup>

故惠邑團失敗理由在於：「此團雖具意匠，然無廣告的意味，是以難蒙上賞，可知花樣貴合時也」。<sup>81</sup>言詞中表明，當時此種活動之首要目的即是打廣告、作宣傳，而非純粹技藝競賽，因此必須配合時宜乃能獲勝。

大正十年慶安宮陣頭遊行之競賽結果，報紙曾詳載奪勝者之原因分析，有如下之說明：

是日大小各團計五十餘團，一團詩意故事或數隊，共百餘隊，無不爭奇鬪巧，就中優劣不等，由值年爐主豫備金銀牌十二面，委審查員七人，於生生醫院前審查棚上，逐隊審查。……，結果米穀商團所裝歷山耕田托拐弄仙姑二故事，與煙草商團之煙草旗及假裝專賣局，同占優點，而點數適相符，由二團代表拈鬮，米穀團遂居一等，而屈煙草團為二等，同賞金牌。三等之內地人打錫團，及四等之石炭商團，亦同點數，而拈鬮定之同受金牌，然石炭團之天女散花，裝飾雖巧，已見於他處賽會，且無廣告意，究不若打錫團之錫旗，其薄如紙，而各旗中又有神名字樣之尤精巧恰合也。五等土木請負團，裝土木請負作業，頗嫌其粗，惟合廣告意，亦受金牌。六等鐵道機關庫保線係團以下，三福公司、冰團、自轉車、水產、金銀商、玉泉酒公司各團，皆以廣告，而受銀牌賞，得金者五，得銀者七，共賞十二團。……，是日午後四時，在慶安宮舉行賞品授與式，發表後煙草團以意匠特色，不獲一等，頗不服，然與米穀商團均取足點，因拈鬮而落二等，夫復何尤，且米穀商團歷山故事，托意甚高，

<sup>80</sup> 〈基隆二大祭典〉，《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6月7日，4版。

<sup>81</sup> 〈基隆特訊——迎神續紀〉，《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6月8日，6版。

勝於煙團之僅廣告而無故事也。<sup>82</sup>

由此更可觀察出，陣頭遊行賽會中的強烈廣告效果與商業性質，且惟有符合廣告效果、宣傳意味，才是致勝獲獎真正關鍵。

又昭和元年的慶安宮媽祖遶境情形亦為一重要例子。當時參與行列團體有三十九番，即獅陣團、歐美雜貨商、金商團、光麥酒團、三井落水工團、土水團、巧聖先師團、生輪自轉車團、聖王公廟口行商團、江姓團、衛生團、日用團雜貨商團、石炭商團、泉郡團、糕餅商團、陳金火團、青果仲賣團、同小賣團、小基隆團、永發米商團、第十組得意堂團、新合順豚商團、酒小賣商團、藥種商團、林姓團、郵樂社團、水產仲賣團、材木商團、第十一組音樂團、基隆海產物商團、魚菜商團、藤豆製造會社團、冰仲賣團、基隆港舢舨團、第一組聚樂社團、中部臺洋兩漁業株式會社團、田寮港團、新英社團、第八組慶保堂團等。這些參與者之陣頭「多有應用廣告的意義」，<sup>83</sup>而彼此競爭結果是：

最優秀兼含有廣告意味者，為基隆港舢舨團所裝之東坡遊赤壁，閣上造木舟丈餘，首尾有兒童數名，裝作舵公，間置彩幕，幕中擇妙妓飾蘇東坡，及其伴客，頗費苦心，惜乎無配以夜景，舉酒酌客，誦明月之詩，難以點出。次為石炭商團之魔王一生地穴；海產物商團之琴高捉鯉，封酢教廉，漁郎問津；酒小賣商團所裝之胡姬賣酒；魚產仲賣團之金太郎捉鯉，解縉釣魚寄酢供母；衛生團之禹王治水，烏金炭之美譽；漁業團之觀音收良女；日用雜貨團之西遊盤絲洞；田寮港團之紅沙車等，俱得入賞。此外，如芭蕉團之桃中得子，三井浮船員之仙人泛舟等，亦各含有廣告意味。<sup>84</sup>

觀察這些參與團體，多屬經營工商業者，且除漢人經營者外，另有屬日資之團體與會社，如三井落水工團、藤田豆粕製造會社團等，其參與目的明顯可知屬商業活動，具廣告宣傳性質及效果。又上述參與慶安宮媽祖遶境

<sup>82</sup> 〈基隆聯合祭典紀盛〉，《臺灣日日新報》，1921年6月5日，6版。

<sup>83</sup> 〈基隆迎媽祖盛況行列通過約費一時間地方來觀者七八萬人〉，《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5月29日，4版。

<sup>84</sup> 〈基隆迎神雜觀詩意閣爭奇闢巧音樂團搜羅繡旗〉，《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5月30日，4版。



陣頭行列之新合順豚商團、魚菜商團，亦參與中元祭水燈與陣頭遊行活動，其目的應亦屬相同。此種陣頭遊行活動除為商行店家之打廣告宣傳自家產品外，逢景氣不佳時，亦可藉此挽回商況，提振經濟。如昭和二年報載：「基隆慶安宮，媽祖遶境，訂來十七日，依例舉行，本年爐主，林朝寶氏，外當事者等，已自前月著著準備，竝鼓吹陣頭參加，擬以盛大舉行，挽回商業不況」；<sup>85</sup>昭和三年報紙又載：本年慶安宮媽祖遶境，「當盛大舉行，藉以挽回市況」；<sup>86</sup>而昭和五年報紙亦云：「景氣日非，欲藉賽會，以挽回市況」。<sup>87</sup>報紙之諸多報導，呈現出的重要意義就是陣頭遊行活動的強烈商業性質與經濟目的。

#### 四、身為同風會會長的許梓桑與基隆中元祭

基隆同風會原名敦俗會，成立於大正三年，目的在「改良一切弊俗」，特別是「改良交際送迎吉凶賀弔及迎神賽會諸禮節」；會長為基隆區長許梓桑，副會長初為前保甲局長張達源，<sup>88</sup>後則由士紳顏雲年(1875-1923)擔任。<sup>89</sup>許梓桑透過敦俗會對日治時期社會工作之投入甚多，被日人稱為是「努力教化的社會事業家」。<sup>90</sup>

敦俗會成立之初，會則第十條即言：

凡吉凶交際迎神賽會諸禮節，總以適合時宜，勿尚奢華為主，一切外觀炫耀，均屬無益，今經公議改良，諸會員宜一般遵守會規，實事求是，勿背本會創立之趣旨。

<sup>85</sup> 〈十七日媽祖繞境請發臨時列車〉，《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5月9日，4版。

<sup>86</sup> 〈慶安宮媽祖繞境先聲〉，《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5月9日，4版。

<sup>87</sup> 〈磋商迎神〉，《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4月6日，4版。

<sup>88</sup> 〈基隆敦俗會成立〉，《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8月17日，4版；〈基隆敦俗會後聞〉，《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8月24日，4版；又有關基隆同風會之略述可見簡萬火，《基隆誌》，頁173。

<sup>89</sup> 顏雲年於大正六年初已接任敦俗會副會長職務；見〈基津春宴盛況〉，《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1月10日，6版。

<sup>90</sup> 伏喜米次郎，《グレート基隆》(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臺1版，據基隆新潮社，1932版景印)，頁7。

而會規第十七條更針對中元普度活動有明文規定，其言：

中元普施，例年輪流主普及諸柱首，窮極奢侈，虛費金錢，實為無益，自今以後，各宜儉約，勿尚奢華，至於各家陳設豚羊犧牲果物，例有餽贈，今議一律刪，以省糜費，而重衛生。<sup>91</sup>

可見其對中元祭之規範要點為力求儉約，方法則是禁止彼此間之祭品餽贈舊習。

敦俗會成立次年(大正四年)，適逢林姓輪值主普。林姓為基隆輪值主普十一姓中之大姓，被稱為「金雞貂石四堡中，人數最多最富者」。<sup>92</sup>敦俗會之主張立即招來輿論對林姓奢華之批評，當時報載：

舊七月廿六日基隆中元之準備，本年值林姓，十分奢華，以背敦俗會之規則，經對當事者力勸之，不肯相聽。查林姓本年之費，實有過多，有碍地方之經濟，主普林姓，人眾既多，殷富不少，本年輪值，其會務必窮奢極侈，爭奇鬪勝，勢欲壓倒例年輪值之十姓，以誇耀於里閭。……噫！廢有用之財，而糜無益之費，愚實甚也，論此中元之費，自清時代，及領臺以後，每年大小姓不過千圓，以至二千之多，未聞今年如此之奢華，設或緣款之多，不宜盡用，或抽些為慈善，或存為公款，較為有益，況去年敦俗會創設以來，凡陋習舊規改良，大舉成效，本年之中元，不特毫無改良，且比常年踵事增華，於敦俗會規則中第十七條所載，中元之普施要儉約，勿奢華，其會旨，毋乃太背乎，當此地方稅款，及慈善義舉之事，人每多於怠納，不見勇為，而觸於祭鬼之用，傾囊以助，有碍地方之經濟，當局知之，當不容其如此也。<sup>93</sup>

由上可知，基隆林姓因人多勢眾、財力豐厚，故亟欲在中元普度活動裡展現雄厚地方實力，卻引來輿論關注；敦俗會成立的努力目標之一，即在對中元普度活動的力求儉約，自然對此大姓之鋪張舉措有所關切。

<sup>91</sup> 〈基隆敦俗會成立〉，《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8月17日，4版。

<sup>92</sup> 〈準備盂蘭〉，《臺灣日日新報》，1915年8月15日，6版。

<sup>93</sup> 〈基隆準備普度續聞〉，《臺灣日日新報》，1915年8月17日，6版。

大正年間，順應臺北州各地同風會陸續興起，<sup>94</sup>基隆敦俗會亦於大正八年(1919)更名為同風會，「以符風同道一之義」，<sup>95</sup>會長仍為許梓桑，副會長初為顏雲年。大正十二年(1923)顏雲年過世，同風會改選其弟顏國年接任副會長之職。<sup>96</sup>

同風會成立後次年的大正九年，恰為許姓輪值主普，許梓桑身為基隆許姓大家長，亦同風會負責人，自然須以身作則，配合同風會主張之儉約主義，以為表率。該年中元普度即不設主普壇，僅於農曆七月廿五日燃放水燈，廿六日陳牲普施而已。當時報紙曾載：「無知小民有譏其過儉者，然在智識階級，則以為寧使愚民譏，勿貽文明笑也，寄語許姓，其為人表率，勿恤人言，幸甚。」<sup>97</sup>可見許梓桑作法實為創舉，惹人注目。

昭和元年，又值林姓輪值主普，基隆同風會於正式普度前的七月廿七日午後八時開會。出席者除會長許梓桑、副會長顏國年外，含顧問深水要塞司令官、岩田署長、佐藤市助役、庄司市視學、大貫警部、小山第一公學校校長及役員廿餘名。會中決議：

宣傳舊中元普施，質素從事，竝各戶祭品，贈答廢止之件。實行方法，選舉顏國年、潘榮春、張士文、黃鄉齒、蔡慶雲等五氏，為交涉委員，勸告主普林姓，及各柱首代表者，質素從事，勿尚奢華，節約冗費，以養民力，竝印刷宣傳單，撒布全市，廢止各戶祭品贈答以省糜費，而重衛生。<sup>98</sup>

當年八月二日午後八時，基隆同風會更邀集主普林姓代表者及各柱首十一名開懇談會。出席者有佐藤基隆市尹、岩田署長、佐藤市助役、庄司市視學，以及交涉委員顏國年等四人，協議舊曆七月廿六日中元普施，費

<sup>94</sup> 林麗卿，〈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教團體與社會變革——以臺北州同風會為例〉(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7)，頁17-29。又有關臺北州同風會之發展情形，可見游秀玟，〈殖民體制下的文化革新——1920年代的同風會與文化協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頁8-22。

<sup>95</sup> 〈基隆特訊〉，《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7月7日，6版。

<sup>96</sup> 顏雲年於大正十二年過世，同風會副會長於當年改選，由其弟顏國年接任；見〈基隆——同風會總會〉，《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6月1日，4版。

<sup>97</sup> 〈基隆短信——中元破例〉，《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9月8日，6版。

<sup>98</sup> 〈基隆同風會決議事項〉，《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7月31日，夕刊4版。

用節省事宜，決議實施事項為：

一、半普祭典費用，比豫算節省三成以上。二、廢止主普對最大及最小豬公，獎賞金牌之事。三、現時未有豬公之人，當以自發的，買入小豚以省費用。四、各柱首，極力節約，質素從事，勿相競爭。五、市內廣告臺，由同風會，揭出廣告，及配宣傳單，使各戶互相節約，並廢止祭物贈答，以省糜費，而重衛生。<sup>99</sup>

觀此內容可知，同風會除對傳統祭品贈答之舉予以約束外，亦反對牲豚競賽活動。該年輪值主普的林姓本規畫祭典費需一萬餘圓，「嗣因基隆同風會，出為勸誘，節省虛費，故即決定節省三成，變更為七千餘圓」。<sup>100</sup>

當時，基隆同風會為宣傳廢止中元祭品贈答，因此舉實有礙衛生及耗冗費，故預定自八月廿三日至廿九日一週內，分別至蚵殼港、石硬港、獅球嶺、曾子寮、牛稠港、田寮港、哨船頭、草店尾、媽祖宮口等地，每夜七時半起，開管內各戶主會，徹底宣傳，並映活動寫真，以提供免費觀覽，希望幹部員全部出席，共相提倡以期實行。<sup>101</sup>其宣傳文書內容為：

蓋聞羲皇之世，民風尚樸，里閭無賭賽之聲，鄉黨有輯熙之象，迨至風氣漸開，民情日侈，凡有迎神賽會，靡不踵事增華，圖悅耳目，如我基隆，中元普施，例年主普及各柱首互相競爭，窮奢極侈，虛費金錢，毫無吝惜，又如各戶，陳設犧牲及果物，亦必盡其豐富，以備贈答之用，竟不知普施幽冥，不在奢華，惟具誠恪之心而已，既忘本而逐末，遂相習以成風，此有心人，所以竊竊悲也，者番基隆同風會，出為提倡，勸誘主普及諸柱首，節省虛費留資實用，並廢各戶祭品贈答，以省糜費，而重衛生，希望市人，自此舊七月中元，實行左列事項，則他方幸甚，本會幸甚。一、主普及諸柱首，各宜儉約，勿尚奢華，蓋競爭奢侈，虛廢金錢，實為無益。二、神之憑依，在德不在物，各戶普度費用，自宜儉約，無須過於豐富，

<sup>99</sup> 〈基隆人士協議普施節約並廢贈答〉，《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8月5日，4版。

<sup>100</sup> 〈基隆慶安宮中元主普續聞〉，《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8月15日，夕刊4版。

<sup>101</sup> 〈基隆同風會開戶主會宣傳納稅並廢止中元贈答〉，《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8月22日，4版。

蓋普施幽冥，不在祭品豐富，惟具虔誠之心可耳。三、各戶陳設犧牲果物，例有贈答，自本年起，一律廢止，既省糜費，又免枝節之類，蓋暑天祭品，易於腐敗，互相贈答，有碍衛生。四、戶稅納期，迫在眼前，如能節省費用，為納稅之資，則所謂國課早完，雖囊廩無餘，亦得至樂也。<sup>102</sup>

可見其主要強調基於暑天衛生考量，反對中元傳統習俗彼此以祭品互相贈答之行為。且祭祀重誠心非外觀，更主張由此活動中之節約經費，可便於完糧納稅盡國民責任。

昭和四年，何藍韓姓輪值主普時，同風會再度要求島人廢止中元贈答。報載：

島人中元普度，每有互相贈答祭品，既不經濟，又碍衛生，同風會早有宣傳廢止，然尚有多少未盡實行者，故乘此回賽會，再為宣傳，以期徹底實行，至於牲豚贈答(俗曰口份)，亦在廢止之內云。<sup>103</sup>

昭和五年，吳姓輪值主普時，基隆同風會又開會決議，鳴鑼通知全市，希望市民厲行廢止贈答，更關注到行腳僧人利用中元致祭時至各戶誦經，收取紅包之不當舉措，因報載：

從來當地中元賽會，各戶皆備祭品，於門前致祭。主普人家，則備牲豚，陣列於主普壇附近，或於自宅前致祭。每有散僧侶，擅來誦經，索取紅包，本年一律廢止，縱有仍舊擅來誦經，亦可免贈與紅包，以杜倣尤，矯正惡俗。<sup>104</sup>

其並更進一步解釋說：

一、中元普度之時，行腳僧擅到各戶念經，索取紅包(謝禮)，有碍風俗，一律廢止。二、迎神賽會之時，由各地方入市之乞丐，到底徘徊行乞，有碍社會體面，竝常惹起事故，自今嚴為取締。<sup>105</sup>

可知此時同風會對普度期間因普施造成各地行腳僧或乞丐齊聚市中，影響

<sup>102</sup> 〈基隆同風會宣傳中元祭品贈答廢止〉，《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8月25日，夕刊4版。

<sup>103</sup> 〈基隆——廢止贈答〉，《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8月30日，夕刊4版。

<sup>104</sup> 〈慶安宮普度禁乞丐及散僧到處勒索〉，《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9月14日，夕刊4版。

<sup>105</sup> 〈慶安宮中元河燈盛況普度被雨掃興〉，《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9月19日，4版。

社會秩序及市容觀瞻甚為關切，亦主強力禁止。

昭和九年(1934)，劉唐杜姓輪值主普。該姓亦為基隆輪值主普十一姓中之大姓。基隆同風會仍乘舊中元，當地各廟宇陸續舉行普度，為改陋習，得市教化聯合會及社會事業助成會後援，印刷傳單數千枚撒布全市，宣傳事項。其內容如下：

一、中元各廟宇普度，例由各舖戶，提出孤飯，以祭孤魂，自今欲改為孤米、白米，以代孤飯，而省炊工，較為便宜，倘有守舊，不欲改良，仍以孤飯提出者，亦聽其自由，不以強制之也。二、中元普度之時，行腳僧(概係臨時裝成之假和尚)，擅到各戶誦經，索取紅包，有碍風俗，一律廢止。三、中元普度，祭品贈答，徹底實行廢止。四、迎神賽會之時，由各地方入市之乞丐，到處徘徊行乞，有碍社會體面，竝常惹起事故，自今嚴為取締。<sup>106</sup>

可見此時，同風會除以往主張廢止祭品贈答、牲豚競賽及行腳僧與乞丐聚市之內容外，又加上將祭品中之孤飯改為孤米以節約物力之舉措。

昭和十年，陳胡姚姓輪值主普時，該姓亦屬輪值主普十一姓中之大姓，被當時報紙稱為是「十一姓中之惟一大姓」。<sup>107</sup>基隆同風會又乘當地慶安宮舊中元普度，舊廿五日夜放河燈，廿六日夜普施之機會，印刷陋習改良宣傳單五千枚，分配全市，以期實行，再次重申相關內容，並輔以更詳細說明，以解釋其義：

一、各廟宇中元普度，例由舖戶，供奉孤飯，以祭孤魂，今改孤米(白米)以代孤飯，而省炊工，較為便宜。

從來廟宇普度，各舖戶供奉孤飯，以祭孤魂，祭畢，贈與養命堂，為乞丐糧食，然每年孤飯甚多，一時食用不盡，致以賤賣為飼豚之用，甚不經濟，想彼孤魂，亦與人同，有此不經濟之嘆也，當地經行一年望再實行徹底，將孤飯改為孤米，即將白米，少自二升，或三、四、五升不拘，入於米袋，記入氏名為感。

<sup>106</sup> 〈基隆同風會提唱改善度孤飯為孤米一般贊成當見實行〉，《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9月2日，8版。

<sup>107</sup> 〈準備普施〉，《臺灣日日新報》，1913年8月17日，6版。

二、中元普度之時，行腳僧擅自各戶念經，索取紅包，有碍風俗，一律廢止。

從來當地普度，各戶備祭品致祭，或主普人眾備牲豚陳列於主普壇附近致祭，每有行腳僧(散和尚)擅來念經，索取紅包，但地方入市致祭主普之人，唯備牲豚，不帶金錢，被其勒索，殊為唐突，縱敢擅自念經，可免贈與紅包，如敢強制要求者，可報告警官，或通知巡察中的雙葉青年團幹部，定當嚴罰，以杜倣尤。

三、中元普度，祭品贈答徹底實行廢止。

中元普度，各家陳設豚羊犧牲果物，例有互相贈答，本會曩已宣傳廢止，奈有一小部分，未盡實行，自今各宜徹底實行廢止，以省冗費，而重衛生。

四、迎神賽會之時，由各地方入市之乞丐，到處徘徊行乞，有碍社會體面，竝常惹起事故，必嚴為取締。

乞丐徘徊行乞，或出於不得已，或有詐飾者，若稍不注意，則常惹出盜難，當地乞丐，早已收容於養命堂救養，凡迎神賽會，每由地方入市行乞者有之，實碍社會體面，此等乞丐，當請他本居地當局救養，毋須放任其到處行乞，若發見乞丐之時，可免與金品，即刻通知市役所教育課(電話五八四番)自當善為處置也。

五、敬鬼神，重祭禮，燒金紙，實無益，各宜鑑戒。

夫鬼神之事，原屬渺茫故聖人云，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若祭祀之道，無非崇拜敬禮，效法觀感，以起敬慕之忱，竝非燒金紙以求福，亦非不燒金紙而得禍，所謂鬼神之德，在乎人之觀感，敬心與敬禮而已，捨此，別無他事也，深望有識者，了徹此鬼神之祭祀，只好潔誠焚香頂禮斯可矣，切勿以燒金紙是尚，徒耗虛費竝惹意外之災，則幸甚。

六、中元普度，陳列祭物，戒勿掠奪，以免取締。

中元普度，陳列祭品，及看牲人物，非惟敬鬼神意義，且欲使人人來觀，蘭盆勝會，以娛心目，尤望家主各自戒其子侄，所有陳列祭

品任人縱覽，不論何物，不宜掠奪，敢此之為，定當請官嚴辦。<sup>108</sup> 相關宣傳內容，除強調廢止祭品贈答及改用孤米、禁行腳僧與乞丐外，再加上禁燒金紙及搶掠祭物二項。其中，禁燒金紙之舉為全臺各地首倡，實令人耳目一新。<sup>109</sup>

同風會自成立以來，持續對中元普度之各式要求及普遍宣傳之結果，可以昭和十一年，謝姓輪值主普時，報紙之報導內容略知一二。其言：「基隆同風會從來所宣傳取締，行腳僧、外來乞丐，皆不見隻影，祭品互相贈答，全部廢止。惟主普謝姓豚肉，對親戚知己，尚有多少相贈而已。」<sup>110</sup>可見同風會的長期努力已見若干成效。然禁燒金紙之舉則反造成同風會內部分裂，因會內對此項約束，分積極與漸進兩種不同意見，而會長許梓桑屬積極派，強力禁止燒金紙行為。其早於大正九年許姓輪值主普時，已減少燒金紙數量。此舉為報紙注意，認為該年燒金紙比例減少甚多，「可知島民漸開化」。<sup>111</sup>惟許梓桑與理事張士文、汪榮振為首的漸進派對燒金紙事之步調不一，致漸進派相繼退出同風會以示抗議。昭和十二年(1937)的報紙曾以斗大標題，相當篇幅詳細刊載此事，<sup>112</sup>因此中元普度活動裡廢燒金紙政策之推動及執行效果如何，可想而知。

同風會對基隆中元普度活動要求節約之各種約束，除強調上述各項內容外，亦對年年搭建之主普壇頗有意見。前曾提及，大正九年，許姓輪值主普時，中元普度之一大創舉即廢除主普壇的設立，僅保留廿五日燃放水燈及廿六日陳牲普施部分，當時頗引起人們之討論。蓋基隆中元普度每年均須臨時搭建樓高數層、輝煌亮麗之主普壇供祭典儀式之進行，事後再予

<sup>108</sup> 〈基隆同風會乘普度宣傳各種陋習改良改孤飯廢金紙廢贈答〉，《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8月24日，8版。

<sup>109</sup> 蔡錦堂，《日本帝國主義下台灣の宗教政策》(東京：同成社，1994)，頁335-336。該書有關金銀紙廢燒情形之說明可見頁231-233。書中明白指出：昭和十二年，因中日戰爭爆發，日本殖民統治者欲節約物力，故要求寺廟祭典廢燒金紙並去除金爐。然基隆同風會早於昭和十年即已提出廢燒金紙之呼籲。

<sup>110</sup> 〈基隆慶安宮中元第二夜普施盛況〉，《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9月15日，夕刊4版。

<sup>111</sup> 〈基隆特訊——迎神續紀〉，《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6月8日，6版。

<sup>112</sup> 〈基隆市同風會の内紛愈よ尖銳化〉，《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6月29日，9版。另有關於同風會因廢燒金紙問題引發之分裂情形之說明，參見陳凱雯，〈日治時期基隆慶安宮的祭典活動：以《臺灣日日新報》為主〉，頁189-191。



拆除，實花費甚鉅，且耗損人力、物力。又因各姓競爭心態濃厚，往往競相奢華，欲超越前姓，故一年預算勝過一年，確引起有心改良者注意。因此，許姓輪值主普時，許梓桑即反對搭建臨時主普壇，以節省經費，並為表率。惟次年(大正十年)張廖簡姓輪值主普時，又恢復舊習，斥資搭建樓高三層之臨時主普壇以進行普度活動，「且裝飾一切，務必勝前」。報紙對此舉曾大加評論曰：

去年許姓厲行廢止，意從此去奢就儉矣，不意今年竟比前者更奢，誠地方之憾事。張雖大姓，而當地邇來因財界影響，加以土產大宗之石炭不況，視他處地方窮困尤甚，市內商店倒閉頻頻，即觀街役場徵稅成績，屆期僅納十分之二，為二十餘年來全島未曾有之不況，市民正引為恥，而張姓當事人，不為地方財力計，作此無謂之爭，雖曰誠心由人，當軸不為干涉，然就文明公義觀之，必為有識者所竊笑。噫，餓鬼乃窮老無歸者為之，憐而祭之固宜，然生前欲求一餐，當噉爾蹴爾與之，死後則媚之如神明。某生竹枝詞，有道旁野祀多窮老，不祭生人祭死人之句，痛心之言也。<sup>113</sup>

可見觀察者對年年興築主普壇並競相奢華之舉不僅強力批判，更極盡嘲諷之意。

事實上，為免年年耗損，昭和元年開始，已有輿論希望在高砂公園內建一固定主普壇，由輪值主普各姓合資，平時為音樂堂，定期舉行演奏會，娛樂市民，農曆七月普施之時，則充為主普壇利用，實可「移無用之財，為有用之資」。<sup>114</sup>基隆同風會於昭和二年十一月廿七日開會時，即著手規劃高砂公園建音樂堂之事，<sup>115</sup>且此後在定期會議中，持續追蹤音樂堂興築進度。<sup>116</sup>

昭和三年，同風會開會時又有提議此事者，故由同風會長許梓桑、副

<sup>113</sup> 〈基隆特訊——貽笑文明〉，《臺灣日日新報》，1921年8月26日，6版。

<sup>114</sup> 〈基隆市人望設音樂堂並期奏樂〉，《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8月15日，夕刊4版。

<sup>115</sup> 〈基隆同風會例會協議事項〉，《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11月29日，夕刊4版。事實上，同風會早於當年九月已將建音樂堂案列入役員例會中的協議事項，見〈基隆同風會協議事項決定〉，《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9月27日，2版。

<sup>116</sup> 〈基同風會例會家畜會社不寄附役員大起恐慌〉，《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1月31日，夕刊4版。

會長顏國年，及理事潘榮春三人連署，向基隆市役所提出請願書，籲政府當局將之列入昭和三年度之建設中，費用由市役所及主普十一姓分擔。當時認為，該音樂堂完成之時，基隆可新添一宏偉建築，市民多一處娛樂場所，而「每年主普壇可無競爭，節省結壇費數千圓」。<sup>117</sup>在各方努力奔走及持續推動下，<sup>118</sup>昭和四年中元普度前，基隆固定主普壇終立於高砂公園內，使當年輪值主普的何藍韓姓得運用。固定主普壇為八角形，全部鐵筋及鐵骨混凝土築成，樓高三層。因恐日後各姓競爭日趨奢華，主普壇僅有主壇一座，兩邊無附屬小壇。<sup>119</sup>惟實際上，各姓日後仍在主普壇之外觀擴建與裝飾布置上競相爭華，彼此互較高下之態未曾中止。<sup>120</sup>

又值得注意的是，基隆同風會對中元普度活動雖有一定限制，仍亦對此傳統節慶活動提供相當程度之協助與支援。如昭和元年，林姓輪值主普時，同風會即與主普當事者磋商，願提供設備及茶果，並與市內靈安郡及慶保堂兩音樂團接洽演奏事。惟靈安郡因故不能應請，擬於另日自為演奏。慶保堂則承諾義務洋樂演出，供一般人欣賞，以增加民眾娛樂內容。<sup>121</sup>

昭和五年，賴姓輪值主普時，同風會附屬的基隆第一、第二青年會，<sup>122</sup>預想中元活動兩日間人眾雜踏，故全體總動員協助維持交通秩序，並設迷兒保護所及臨時救護所，提供民眾需求。迷兒保護所設於兩處，其中之一即在慶安宮左室，另一在基隆同風會館；臨時救護所則與基隆博愛醫院、草店尾濟生醫院、新興廣生醫院、媽祖宮口仁德醫院合作，提供免費醫療救助。<sup>123</sup>又至昭和六年，許姓輪值主普時，因楊姓自臺北引進特大水燈排，

<sup>117</sup> 〈基隆高砂公園將建音樂堂兼用主普壇〉，《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月14日，4版。

<sup>118</sup> 昭和四年一月同風會開會時，還追蹤報告音樂堂建築相關事。見〈基同風會例會家畜會社不寄附役員大起恐慌〉，《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1月31日，夕刊4版。

<sup>119</sup> 〈基隆慶安宮普施〉，《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8月28日，4版。又有關基隆主普壇由臨時搭建至發展成固定建築之歷程說明，可參見吳蕙芳，〈基隆中元祭裡的主普壇〉，《東華人文學報》，第15期(花蓮，2009.07)，頁231-234。

<sup>120</sup> 各姓在每年主普壇興築上之競賽，無論是外觀上之爭奇鬥艷，或經費上的支出耗費，可參見吳蕙芳，〈基隆中元祭裡的主普壇〉，頁234-237、246-253。

<sup>121</sup> 〈利用主普壇主催音樂會〉，《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9月1日，2版；〈洋樂の演奏基隆ての催し〉，《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9月2日，夕刊2版。

<sup>122</sup> 有關基隆同風會所屬第一、二青年會之概述，可見簡萬火，《基隆誌》，頁171。

<sup>123</sup> 〈基隆慶安宮普施舊廿五廿六日盛大舉行祭品搶奪嚴為取締〉，《臺灣日日新報》，

交通維持頗為不易，第一、第二青年會仍極力整理交通，使市內各地得暢通無阻。<sup>124</sup>事實上，同風會所屬青年團早於年度工作中即規畫在中元祭典時協助提供免費休憩所、患者救護、交通取締、迷兒保護、茶湯設備等事項，<sup>125</sup>故其相關作為亦常見諸報紙報導。

## 五、結語

今日基隆中元祭裡，最為人關注的特色之一乃姓氏輪值主普制，而姓氏輪值主普制實與宗親組織密切相關。清咸豐五年，姓氏輪值主普制開始運作時，基隆並無宗親會的成立；全臺宗親會的普遍出現，實在 1920 年代，特別是日治時期的昭和年間，且成立目的係透過宗親會凝聚同姓宗族力量以建宗祠及修祖譜。<sup>126</sup>基隆許姓宗親會亦是在此背景下成立，而並非為基隆中元祭之運作才形成的。

基隆許姓宗親會雖於昭和二年正式成立，然其存在時間甚短，前後不到四年。此四年中，許姓並未輪值主普，迨許姓負責輪值主普時，宗親會已解散。日治時期，許姓數次輪值主普，且能將相關工作順利完成，固然仍需依靠許姓宗親們的協助，然由於基隆許姓人少勢孤，故許梓桑個人的地位與影響力在基隆中元祭輪值主普之事上或許較宗親會此一團體更顯重要。

蓋許姓於姓氏輪值主普制施行時的清咸豐年間，應為具相當實力之地方大姓，乃能有足夠實力與一定能力進入輪值主普行列，成為輪值主普十一姓之一，惟其實際運作情形，限於史料，難以得知。然許姓經過數十年之發展後，至日治時期的昭和年間，其勢力卻已不若其它輪值主普姓氏(如

---

1930年9月16日，8版；〈基隆中元普度續報因前夜觀河燈被雨觀眾大不如前年〉，《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9月20日，4版；〈慶安宮放水燈燈排遭雨零亂每番列車觀客擁到〉，《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9月20日，夕刊4版。

<sup>124</sup> 〈基隆慶安宮中元加蚵仔燈排好評青年會員整理交通不軌之徒加以惡言〉，《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9月10日，8版。

<sup>125</sup> 黃樹水編，《基隆同風會青年團概覽》(基隆：基隆同風會，1937)，頁41。

<sup>126</sup> 有關基隆宗親會成立之背景，參見陳燕如，〈中元普度與政商之間：日據時期基隆地方領袖的發展〉(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06)，頁106-118；吳蕙芳，〈宗親組織與基隆中元祭：以黃姓宗親會為例〉，頁127-128。

林陳張劉姓)與新興姓氏(如顏李黃楊王蔡姓),<sup>127</sup>故許梓桑在輪值主普負責籌辦諸事之表現上,總較其他輪值主普大姓顯得低調與保守,亦不參與主普外的主會、主醮、主壇三大柱祭祀事,甚至與輪值主普諸姓開會討論開放外姓加入輪值主普行列,以減輕沒落姓氏之輪值主普負擔,亦使有能力之新興姓氏得挑起重擔,持續傳統工作。許梓桑上述種種舉措,具體反映出日治時期許姓沒落不如以往之事實,且許姓無法藉由宗親會在基隆中元祭裡輪值主普之工作,重整或提振該姓在地方上之勢力與影響力。日治時期的基隆許姓,主要是靠許梓桑個人之力量乃得維持。

許梓桑自日本殖民統治基隆後即被日人網羅,長期涉入地方政治並參與民間社會活動,其同時為傳統廟宇慶安宮之管理人及新式社團同風會的會長;此二社團在基隆中元祭裡的角色與作為實有某種程度之對立性。因慶安宮於日治時期已為基隆中元祭內壇所在地,外壇四大柱實以其為核心,分布四周形成一完整祭祀區域;許梓桑以慶安宮管理人身分,在基隆中元祭活動裡扮演協調角色,專門負責協調出適當人選進行主普外三大柱之祭祀活動。為使相關工作得順利進行,其引進慶安宮祭典模式,主張由地方保正輪流負責主普外三大柱之主會工作,並可藉由保正身分,令地方分攤經費,使三大柱中的主會一如主普般,有較固定及有力之負責人持續進行。

相較於慶安宮管理人身分是協助基隆中元祭之普度工作能順利進行,令傳統活動得綿延不絕,同風會會長則是對民間社會之傳統習俗與活動進行改革。基於節約原則、衛生考量及市容維持,同風會約束基隆中元祭普度活動之項目不斷增加,從最初主張廢祭品贈答、牲豚競賽,到以孤米取代孤飯、禁行腳僧與乞丐,乃至廢燒金紙、禁搶掠祭品,亦籌建固定主普壇取代年年搭建事後拆除之臨時主普壇等內容,同風會對諸項目無不努力宣傳,詳細說明,以改良舊俗之奢華競爭與耗損資源。特別是針對人多勢

<sup>127</sup> 據昭和六年出版的《基隆誌》一書中,載及當時基隆重要人物三百零九人中,許姓僅有四人,居輪值主普十一姓之末,而其它姓氏人數比重依序為:陳胡姚姓第一,林姓第二,張廖簡姓第三,劉唐杜姓第四,鄭姓、何藍韓姓第五,吳姓第七,謝姓第八,江姓、賴姓第九;相關數據與內容說明參見吳蕙芳,〈地緣衝突的血緣化解?基隆中元祭與姓氏輪值主普制〉,頁66-67。

眾、財大力豐的數個輪值主普大姓，如林姓、陳胡姚姓、劉唐杜姓等，同風會在當年總是更為積極地規勸，恐其大展該姓實力而競相奢華，帶動不良風氣，故報紙之相關報導亦往往是長篇大論，鉅細靡遺地解釋禁止原委。觀察同風會之努力成果，其確實在廢祭品贈答、牲豚祭祀、禁行腳僧與乞丐方面達成一定功效，惟其它方面則似未臻理想，距目標仍有相當距離。

又當時許梓桑身為同風會會長，在該會對基隆中元祭要求節約之各式規範中，頗能以身作則，為人表率。如在固定主普壇未構築之前，即於輪值中元主普工作時，率先不搭建主普壇以從事普度活動，實為創舉，惹人注目。惟探究實際原因，除許梓桑身為同風會會長不得不身體力行，為人楷模外，許姓在當時本已沒落，實力亦不足以鋪張奢華，故配合同風會對基隆中元祭之規範要求亦順理成章，理所當然之事。

值得注意的是，同風會針對基隆中元祭活動之各式約束裡，不見其對水燈及陣頭遊行活動之花費支出有所規範；許姓負責輪值主普工作時，許梓桑對他姓引進豪華水燈排以吸引人氣、展示力量之舉，亦未予禁止或提出負面評論。仔細觀察其由，實在於商業利益及繁榮地方經濟考量。蓋日治時期，基隆各廟宇祭典均有陣頭遊行活動，尤以慶安宮規模最大，其目的即在利用陣頭遊行以達廣告宣傳效果，藉此打響自家產品知名度，促成交易活絡、增進商業利益以繁榮地方經濟。因此，身為慶安宮管理人的許梓桑對基隆中元祭裡陣頭遊行之舉自然不排斥，而身為同風會會長的許梓桑亦對此活動未予禁止。故水燈與花車之陣頭遊行活動在日治時期的基隆中元祭得保存並持續至戰後，且發展成今日基隆中元祭裡甚為重要且引人注目之內容。

惟戰後對於基隆中元祭裡的水燈與花車遊行活動，往往賦予「以賽陣頭代替打破頭」之意涵，即認為清咸豐五年為化解大規模漳泉械鬥造成的慘重傷亡，除經由姓氏輪值主普制固定每年普度工作之負責者，以輪流舉行祭典儀式超度亡靈外，同時，透過每年中元普度裡的水燈與花車遊行之競賽活動，替代以往漳泉族群對立之械鬥衝突。此一說法與歷史事實並不相符。蓋基隆中元祭於姓氏輪值主普制產生時的清咸豐年間，乃至後來的同治、光緒年間，是否已出現陣頭遊行之競賽活動，目前並無相關史料足

以證明確認。然發展至日治時期，基隆中元祭裡確實普遍出現大規模的陣頭遊行活動與激烈競賽場景；其真正目的在商業宣傳與廣告效果，而非藉此消弭昔日漳泉械鬥之族群對立與衝突問題，故兩者應予明確區隔，不可混淆。

## 附圖



圖一：許梓桑。

來源：《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4)。



圖二：許梓桑漫畫圖。

來源：〈臺北州協議會(第一日所見)〉，《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12月19日，2版。



圖三：基隆許姓宗親會成立圖。來源：基隆許姓宗親會提供。



圖四：臺灣許姓宗親會成立圖(一)。

來源：許漢卿總編，《臺灣許姓宗親會創立六十週年特刊》，頁38。





圖五：臺灣許姓宗親會成立圖(二)。

來源：許漢卿總編，《臺灣許姓宗親會創立六十週年特刊》，頁39。

## 徵引書目

### *Bibliography*

#### (一) 史料

1. 〈支那近況——許梓桑〉，《實業之臺灣》，第17卷第4號。  
“Shina kinkyō: Kyo Shisō,” *Jitsu gyō no Taiwan*, dai 17 kan dai 4 gō.
2. 〈獅球嶺平安宮重修誌〉(大正辛酉冬季冬月董事暨紳商等立)、〈大正拾年辛酉冬季改築寄附金氏名列于左〉，1921立於獅球嶺平安宮。  
“Shi qiu ling ping an gong zhong xiu zhi” (Dazheng xin you dong ji dong yue dong shi ji shen shang deng li, “Dazheng shi nian xin you dong ji gai zhu ji fu jin shi ming lie yu zuo,” 1921 li yu shi qiu ling ping an gong.
3. 〈神佛會一覽〉，《南瀛佛教》，第17卷第2期(臺北，1939.02)，頁55-58。  
“Shen fo hui yi lan,” *Nanying fo jiao*, di 17 juan di 2 qi (Taipei, 1939.02), 55-58.
4. 《新高新報》，1930。  
*Niitaka shinpō*, 1930.
5. 《詩報》，1935；1940。  
*Shi hō*, 1935; 1940.
6. 《臺北州下に於ける社寺教會要覽》，臺北：臺灣社寺宗教會，1933。  
*Taihoku shū shita ni oke ru shaji kyōkai yōran*, Taihoku: Taiwan shaji shūkyō kai, 1933.
7. 《臺北州時報》，第2卷第7號。  
*Taihoku shū jihō*, dai 2 kan dai 7 gō.
8. 《臺灣日日新報》，1896-1900；1902-1903；1905-1906；1908；1913-1915；1917-1918；1920-1936。  
*Taiwan nichinichi shinpō*, 1896-1900; 1902-1903; 1905-1906; 1908; 1913-1915; 1917-1918; 1920-1936.
9. 《基隆市鄉土史料—基隆市耆老口述歷史座談會記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Jilong shi xiang tu shi liao: Jilong shi qi lao kou shu li shi zuo tan hui ji lu*, Nantou: Taiwan sheng wen xian wei yuan hui, 1992.
10. 《臺灣紳士名鑑》，臺北：新高新報社，1937。

- Taiwan shinshi meikan*, Taihoku: niitaka shinpō sha, 1937.
11.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1936冊，29件；第1937冊，3件；第2126冊，17件；第5920冊，18件；第6225冊，21件。  
*Taiwan zong du fu gong wen lei zuan*, di 1936 ce, 29 jian; di 1937 ce, 3 jian; di 2126 ce, 17 jian; di 5920 ce, 18 jian; di 6225 ce, 21 jian.
12. 大園市藏編，《臺灣人物誌》，臺北：谷澤書店，1916。  
 Ōzono, Ichizō, hen. *Taiwan jinbutsu shi*, Taihoku: tanizaua shoten, 1916.
13. 大園市藏編，《臺灣の中心人物》，臺北：日本植民地批判社，1935。  
 Ōzono, Ichizō, hen. *Taiwan no chūshin jinbutsu*, Taihoku: nippon shokuminchi hihan sha, 1935.
14. 大園市藏，《現代臺灣史》，臺北：日本植民地批判社，1934。  
 Ōzono, Ichizō. *Gendai Taiwan shi*, Taihoku: nippon shokuminchi hihan sha, 1934.
15. 大園市藏，《臺灣人事態勢と事業界》，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據臺北新時代社臺灣支社，1942影印。  
 Ōzono, Ichizō. *Taiwan jinji taisei to jigyō kai*, Taipei: cheng wen chu ban you xian gong si, 1999, ju Taihoku shinjidai sha Taiwan shisha, 1942 nain ying yi.
16. 丸井圭治郎，《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1卷，臺北：捷幼出版社，2006，增訂1版，據1919刊印。  
 Wanjing, Guizhilang. *Taiwan zong jiao diao cha bao gao shu*, di 1 juan, Taipei: jie you chu ban she, 2006, zeng ding 1 ban, ju 1919 kan yin.
17. 丸井圭治郎先生遺著，曾景來譯，〈臺灣舊慣的神佛會〉，《南瀛佛教》，第12卷第12期(臺北，1934.12)。  
 Wanjing, Guizhilang xian sheng, yi zhe, Ceng Jinglai yi. “Taiwan jiu guan de shen fo hui,” *Nanying fo jiao*, di 12 juan di 12 qi (Taipei, 1934.12).
18. 內藤素生編，《南國之人士》，臺北：臺灣人物社，1922。  
 Naitō, Motonama, hen. *Nangoku no jinshi*, Taihoku: Taiwan jinbutsu sha, 1922.
19. 石坂莊作編，《基隆港》，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臺1版，據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1917年3版影印。  
 Ishizaka, Sōsaku, hen. *Kiryūkō*, Taipei: cheng wen chu ban she, 1985, ju kabushi kigaisha Taiwan nichinichi shimupōsha 1917 nain 3 ban ying yin.
20. 安藤靜，〈神明會の性質〉，《臺灣慣習記事》，第3卷第7號(臺北，1903.07)，頁659-664。  
 Andō, Shizu. “Jinmei kai no seishitsu,” *Taiwan kanshuu kiji*, dai 3 kan dai 7 gō (Taihoku, 1903.07), 659-664.
21. 安藤靜，〈神明會之性質〉，《臺灣慣習記事(中譯本)》，第3卷第7號(南投，

- 1993), 頁33-36。
- Andō, Shizu. “Shen ming hui zhi xing zhi,” *Taiwan guan xi ji shi (zhong yi ben)*, di 3 juan di 7 hao (Nantou, 1993), 33-36.
22. 伏喜米次郎, 《グレート基隆》, 臺北: 成文出版社, 1985, 臺1版, 據基隆新潮社, 1932年版影印。
- Fuki, Yonejirō, hen. *Gurēto Kiryū*, Taipei: cheng wen chu ban she, 1985, ju Jilong xin chao she, 1932 nian ban ying yin.
23. 谷元二, 《大眾人事錄》, 東京: 帝國秘密探偵社, 1940。
- Tani, Genji. *Taishū jinjiroku*, Tōkyō: Teikoku Himitsu Tanteisha, 1940.
24. 林進發, 《臺灣人物評》, 臺北: 赤陽社, 1929。
- Rin, Shinpatsu. *Taiwan jinbutsu hyō*, Taihoku: Sekiyōsha, 1929.
25. 林進發編, 《臺灣官紳年鑑》, 臺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9, 據臺北民眾公論社, 1934年4版影印。
- Rin, Shinpatsu, hen. *Taiwan kanshin nenkan*, Taipei: cheng wen chu ban she you xian gong si, 1999, ju Taihoku Minshū Kōronsha, 1934 nain 4 ban ying yin.
26. 原幹洲編, 《南進日本之第一線に起つ新臺灣之人物》, 臺北: 拓務評論社臺灣支社, 1936。
- Hara, Kansu, hen. *Nanshin nippon no daiissen ni tatsu shin Taiwan no jinbutsu*, Taihoku: taku tsutomu hyōronsha Taiwan shisha, 1936.
27. 許庭謨先生口述, 基隆: 基隆市許姓宗親會, 2010.07.23。
- Xu, Tingmo xian sheng kou shu, Jilong: Jilong shi Xu xing zong qin hui, 2010.07.23.
28. 張炎憲等採訪記錄, 《基隆兩港二二八》, 臺北: 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1994。
- Zhang, Yanxian deng cai fang ji lu. *Jilong yu gang er er ba*, Taipei: Zi li wan bao she wen hua chu ban bu, 1994.
29. 黃樹水編, 《基隆同風會青年團概覽》, 基隆: 基隆同風會, 1937。
- Huang, Shushui, bian. *Jilong tong feng hui qing nian tuan gai lan*, Jilong: Jilong tong feng hui, 1937.
30. 陳其寅, 〈許梓桑先生像贊〉、〈祭許社長梓桑文〉, 收入《懷德樓文稿》, 基隆: 財團法人基隆市文化基金會, 1992。
- Chen, Qiyin. “Xu Zisang xian sheng xiang zan,” “Ji Xu she zhang Zisang wen,” shou ru *Huai de lou wen gao*, Jilong: cai tuan fa ren Jilong shi wen hua ji jin hui, 1992.
31. 臺南新報社, 《臺灣大觀》, 臺北: 成文出版社, 1985, 據1935年版影印。
- Tainan Shimpōsha, hen. *Taiwan taikan*, Taipei: cheng wen chu ban she, 1985, ju

- 1935 nian ban ying yin.
32. 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  
Taiwan Shin Minpōsha, hen. *Taiwan jinshikan*, Taihoku: Taiwan Shin Minpōsha, 1937.
  33. 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株式會社興南新聞社，1943。  
Kōnan Shinbunsha, hen. *Taiwan jinshikan*, Taihoku: kabushi kigaisha Kōnan Shinbunsha, 1943.
  34. 橋本白水，《臺灣統治与其功勞者》，臺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99，據臺北南國出版協會，1930年版影印。  
Hashimoto, Hokusui. *Taiwan tōchi to sono kōrōsha*, Taipei: cheng wen chu ban you xian gong si, 1999, ju Taihoku Nangoku Shuppan Kyōkai, 1930 nian ying yin.
  35. 橋本白水，《評論臺灣之官民》，臺北：南國出版協會，1924。  
Hashimoto, Hokusui. *Hyōron Taiwan no kanmin*, Taihoku: Nangoku Shuppan Kyōkai, 1924.
  36. 簡萬火，《基隆誌》，基隆：基隆圖書出版協會，1931。  
Kan, Manka. *Kiryū shi*, Ki-run: Toshoshuppan kyōkai, 1931.
  37.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  
Takashu Taichirou. *Taiwan retsu shin den*, Taihoku: Taiwan soutoku fu, 1916.

## (二)論著與編著

1. 〈慶安宮湄洲媽祖與基隆名人許梓桑〉，《慶安宮曆書》，基隆：基隆市慶安宮管理委員會，2011。  
“Qing an gong mei zhou ma zu yu Jilong ming ren Xu Zisang,” *Qing an gong li shu*, Jilong: Jilong shi qing an gong guan li wei yuan hui, 2011.
2. 《基隆市志·人物篇》，基隆：基隆市文獻委員會，1956。  
*Jilong shi zhi, ren wu pian*, Jilong: Jilong shi zheng fu, 1956.
3. 《基隆市志·風俗篇》，基隆：基隆市政府，1979。  
*Jilong shi zhi, feng su pian*, Jilong: Jilong shi zheng fu, 1979.
4. 《基隆市志·人物志·列傳篇》，基隆：基隆市政府，2003。  
*Jilong shi zhi, ren wu zhi · Lie chuan pian*, Jilong: Jilong shi zheng fu, 2003.
5. 吳蕙芳，〈宗親組織與基隆中元祭——以黃姓宗親會為例〉，《兩岸發展史研究》，第4期(桃園，2007.12)，頁125-170。  
Wu, Huey-fang. “Zong qin zu zhi yu Jilong zhong yuan ji: yi Huang xing zong qin hui wei li,” *Liang an fa zhan shi yan jiu*, di 4 qi (Taoyuan, 2007.12), 125-170.

6. 吳蕙芳，〈地緣衝突的血緣化解？基隆中元祭與姓氏輪值主普制〉，《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1期(臺北，2009.05)，頁51-96。  
Wu, Huey-fang. "Di yuan chong tu de xie yuan hua jie? Jilong zhong yuan ji yu xing shi lun zhi zhu pu zhi," *Guo li zheng zhi da xue li shi xue bao*, di 31 qi (Taipei, 2009.05), 51-96.
7. 吳蕙芳，〈基隆中元祭裡的主普壇〉，《東華人文學報》，第15期(花蓮，2009.07)，頁33-74。  
Wu, Huey-fang. "Jilong zhong yuan ji li de zhu pu tan," *Dong hua ren wen xue bao*, di 15 qi (Hualian, 2009.07), 33-74.
8. 吳蕙芳，〈海港城市的傳統節慶活動：以慶安宮與基隆中元祭為中心之探討〉，收入劉石吉、王儀君、林慶勳主編，《海洋文化論集》，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0。  
Wu, Huey-fang. "Hai gang cheng shi de chuan tong jie qing huo dong: yi qing an gong yu Jilong zhong yuan ji wei zhong xin zhi tan tao," shou ru Liu Shiji, Wang Yijun, Lin Qingxun, zhu bian, *Hai yang wen hua lun ji*, Gaoxiong: guo li zhong shan da xue ren wen she hui ke xue yan jiu zhong xin, 2010.
9. 吳蕙芳，〈地方碑刻與基隆中元祭〉，《書目季刊》，第44卷第1期(臺北，2010.06)，頁81-97。  
Wu, Huey-fang. "Di fang bei ke yu Jilong zhong yuan ji," *Shu mu ji kan*, di 44 juan di 1 qi (Taipei, 2010.06), 81-97.
10. 林麗卿，〈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教團體與社會變革——以臺北州「同風會」為例〉，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7。  
Lin, Liqing. "Ri zhi shi qi Taiwan de she jiao tuan ti yu she hui bian ge: yi Taipei zhou 'Tong feng hui' wei li," Taizhong: guo li zhong xing da xue li shi xue xi shuo shi lun wen, 1997.
11. 洪連成，〈基隆中元祭的緣起〉，收入《滄海桑田話基隆》，基隆：基隆市立文化中心，2004。  
Hong, Liancheng. "Jilong zhong yuan ji de yuan qi," shou ru *Cang hai sang tian hua Jilong*, Jilong: Jilong shi li wen hua zhong xin, 2004.
12. 唐羽，〈《魯國基隆顏氏家乘》第7冊〉，臺北：基隆顏氏家乘纂脩小組，1997。  
Tang, Yu. *Lu guo Jilong Yan shi jia cheng*, di 7 ce, Taipei: Jilong Yan shi jia cheng zuan xiu xiao zu, 1997.
13. 唐羽，〈《臺陽公司八十年志》〉，臺北：臺陽股份有限公司，1999。  
Tang, Yu. *Taiyang gong si ba shi nian zhi*, Taipei: Taiyang gu fen you xian gong si, 1999.

14. 陳青松，《基隆第一·人物篇》，基隆：基隆市立文化中心，2004。  
Chen, Qingsong. *Jilong di yi, ren wu pian*, Jilong: Jilong shi li wen hua zhong xin, 2004.
15. 陳青松，《基隆第一·藝文篇》，基隆：基隆市立文化中心，2004。  
Chen, Qingsong. *Jilong di yi, yi wen pian*, Jilong: Jilong shi li wen hua zhong xin, 2004.
16. 陳燕如，〈中元普度與政商之間：日據時期基隆地方領袖的發展〉，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Chen, Yanru. “Zhong yuan pu du yu zheng shang zhi jian: ri ju shi qi Jilong di fang ling xiu de fa zhan,” Taipei: guo li Taiwan shi fan da xue li shi xue yan jiu suo shuo shi lun wen, 1998.
17. 陳凱雯，〈日治時期基隆慶安宮的祭典活動——以《臺灣日日新報》為主〉，《民俗曲藝》，第147期(臺北，2005.03)，頁161-200。  
Chen, Kaiwen. “Ri zhi shi qi Jilong qing an gong de ji dian huo dong: yi Taiwan nichinichi shinpo wei zhu,” *Min su qu yi*, di 147 qi (Taipei, 2005.03), 161-200.
18. 許文堂編，《大基隆古文書選輯》，基隆：基隆市立文化中心，2004。  
Xu, Wentang, bian. *Da Jilong gu wen shu xuan ji*, Jilong: Jilong shi li wen hua zhong xin, 2004.
19. 許漢卿總編，《臺灣許姓宗親會創立六十週年特刊》，臺北：臺灣許姓宗親會，1987。  
Xu, Hanqing, zong bian. *Taiwan Xu xing zong qin hui chuang li liu shi zhou nian te kan*, Taipei: Taiwan Xu xing zong qin hui, 1987.
20. 游秀紋，〈殖民體制下的文化革新——1920年代的同風會與文化協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1995。  
You, Xiuwen. “Zhi min ti zhi xia de wen hua ge xin: 1920 nian dai de tong feng hui yu wen hua xie hui,” Taipei: guo li Taiwan da xue she hui xue yan jiu suo, 1995.
21. 蔡錦堂，《日本帝國主義下台灣の宗教政策》，東京：同成社，1994。  
Sai, Kindō. *Nihon teikoku-shugika Taiwan no shūkyō seisaku*, Tōkyō: Dōseisha, 1994.
22. 劉清番總編，《慶安宮誌》，基隆：基隆市慶安宮管理委員會，2001。  
Liu, Qingfan, zong bian. *Qing an gong zhi*, Jilong: Jilong shi qing an gong guan li wei yuan hui, 2001.
23. 臺灣基隆何藍韓姓宗親會編，《雞籠中元祭輪值主普姓氏源流》，基隆：臺灣基隆市何藍韓姓宗親會，2005。  
Taiwan Jilong He Lan Han xing zong qin hui, bian. *Jilong zhong yuan ji lun zhi zhu*

*pu xing shi yuan liu*, Jilong: Taiwan Jilong shi He Lan Han xing zong qin hui, 2005.



**Xu Zi-sang and his roles  
in the Mid-summer Ghost Festival in Keelung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in Taiwan**

Wu, Huey-fang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Oceanic Culture,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Xu Zi-sang was an important local leader in Keelung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in Taiwan. He was appointed as the chief of Keelung Street, the chief of Keelung District, and the congressman of Taipei Prefecture; serving the local people for almost half a century. The Keelung Mid-summer Ghost Festival was the most prominent traditional festival in this seaport city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and the scale of festival activity was much bigger than other worship ceremonies or festivals, including Matsu, Cheng-huang, Kai-zhang Sheng-wang, and the Japanese Shinto shrine ceremonies.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leaders of places which were important to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and traditional festival activity in Keelung during their colonization. Xu Zi-sang in particular, wa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olitical figure, but also a prominent man in local society at that time. He had three roles to play: the leader of the Xu Clan, the administrator of Qing-an-gong, and the head of the Tong-feng-hui. The Xu Clan was one of a group of eleven, who had cyclically taken responsibility for the running of the festival ceremonies and celebrations since the fifth year of the Qing Dynasty Xianfeng Emperor (1855). Qing-an-gong was the most revered Matsu temple in Keelung, a site of deliverance for the pious who prayed to the sea god, and also the site where the Mid-summer Festival ceremony took place. The Tong-feng-hui was a new kind of association backed by the support of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which, with Xu as the head, aimed mainly to reform

Keelung's social customs. Thus, each of his positions had different obligations in the traditional Keelung Mid-summer Ghost Festival activities.

How did these groups of distinctly different natures influence the most important traditional local festival in Keelung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How did the Xu Zi-sang play the trinity role? These issues have hardly received any attention in the past, and few of them have been analyzed in detail. This paper attempts investigate the issues mentioned above in order to enhance reference material on this topic for the academic circle.

**Keywords: clan organization, Qing-an-gong, Tong-feng-hui, ritual of universal salvation, Matsu belief, local leaders**

